

红旗

HONGQI



20-21

1960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〇年第二十、二十一期 ★

目 录

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經驗的

基本总结.....红旗杂志编辑部 (1)

——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而作

社論：伟大十月革命的道路

是全人类解放的共同道路..... (14)

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邓力群 吳 江 (18)

——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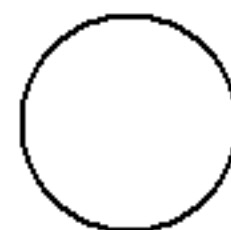
依靠群众,合理分配商品.....郑延石 (36)

——重庆市合理分配商品的經驗

广泛运用运筹学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刘季平 (44)

搞好生活,促进生产.....王桂冀 (50)

碭山县的田間科学研究活动.....刘钦鑑 (54)



中国人民革命 胜利经验的基本总结

——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而作

红旗杂志编辑部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马克思所提出的这个著名的命题，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部伟大的著作中。

列宁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决裂，主要地就是他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原来的革命面貌，并且根据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进一步地丰富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的那些可耻的领袖们之所以成为叛徒，主要地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丢掉了和歪曲了马克思的学说。所以，正如列宁所说的：“如果不在‘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不能展开斗争，不能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①

为了继续阐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列宁曾经打算在“国家与革命”中用比较大的篇幅总结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但是，因为领导十月革命，没有来得及作。列宁后来在他的另一部伟大著作“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实际上作了他原来准备作的这个工作。他

^① “国家与革命”初版序言。



在这个新的著作中，同样不断反复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根本原理：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就要摧毁旧的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的国家机器，用新的、掌握在人民手中的革命的国家机器去代替它。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必须摧毁旧的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革命的国家机器，就因为旧的国家机器是为剥削制度服务的，是剥削阶级保护他们的剥削制度、统治人民的主要工具。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阶级，要推翻剥削制度，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如果不首先破坏军阀主义官僚主义的旧的国家机器，不破坏这个保护剥削制度的主要工具，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列宁强调地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①，主要的意义就在这里。

一定的生产关系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就是社会的上层建筑，而政治制度的问题，主要就是国家机器的问题。不破坏旧的上层建筑，特别是不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就不可能改变旧的社会经济基础。对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说来，就不可能逐步地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就不可能逐步地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些观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反复说明了的。

伟大的十月革命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呢？就是因为俄国无产阶级在伟大的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彻底打碎了旧俄的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新的苏维埃国家机器，使国家由少数剥削者压迫多数人的工具变成多数压迫少数剥削者的工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亚一系列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够建立，也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旧的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的国家机器，被本国人民或者本国人民在追歼德国法西斯匪军的苏联红军的帮助下所摧毁。

① 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中央曾經多次指出，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中国人民大革命又为什么能够胜利呢？道理是同样的。如果我们不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不打碎旧有的军阀、官僚、特务的国家机器，这个胜利怎么能够取得呢？中国革命的胜利，在一个东方大国中，又一次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原理。

各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往往是不完全相同的，往往是有差别的。中国革命打碎反动的国家机器、建立革命的国家机器的具体过程，也带有自己的特点。

十月革命，是由俄国工人阶级在首都举行武装起义开始的。这个革命发展的过程，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但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季开始的中国革命战争，即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是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在一部分乡村中首先取得胜利，又逐步扩大这个胜利，而后才在城市中取得了胜利。这个过程也就是从在农村建立小块的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大块的革命根据地，从建立少数的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多数的革命根据地，从农村包围城市到最后夺取城市。

上述这样的过程说明了：中国人民夺取政权，首先是在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地区上夺取；中国人民打碎反动的国家机器，首先是在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地区上打碎。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通过这样的革命发展过程，经历二十二年之久，取得了全国的胜利，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中国革命的这个发展道路，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

当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背信弃义地对革命的中国人民进行突然的反革命袭击，把革命的人民抛入白色恐怖的血海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①。毛泽东同志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具体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他从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

^① 见“論联合政府”。



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这个事实出发，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不统一和充满着矛盾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一）许多农村小块革命根据地能够在反革命政权的包围下发生、坚持和波浪式地向前扩大；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和革命根据地，是我国民主革命中工农联盟的主要形式，是我国无产阶级领导全国人民争取解放的主要斗争形式；

（三）革命根据地是中国人民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伟大革命阵地，革命人民就是依靠这样的根据地，来打击反革命的进攻，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作为革命进攻的出发点；

（四）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必然会提高全国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逐步动摇反革命统治的基础，促进全国人民大革命的高潮。

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样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提出了在中国条件下革命发展的新公式，从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在东方一个大国的广阔土地上得到了新的胜利，并且充实了新的内容。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两条战线上，不断地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而斗争。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原来的一批投降主义者，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同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相结合，成为取消主义者。他们宣布中国革命已经结束，认为中国人民不应该去触动蒋介石的反革命国家机器，而只能在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之下，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活动，并且无耻地歌颂蒋介石的各种反革命战争，而把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农民游击战争诬蔑为必将失败的“流寇运动”。毛泽东同志驳斥了托陈取消派这种反革命的胡言乱语，坚持了中国人民革命的旗帜，认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的武装和革命的根据地当时虽然还小，而且还只在农村中，但是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

另一方面，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当时有一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冒险主义



者，他們在好几年內占領了党的领导机关，把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大批正确领导同志打下去，使这些同志抬不起头来。“左”倾冒险主义者否认中国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和曲折性，看不到中国革命必须经过的由小到大、由农村到城市的发展过程，急于夺取大城市。他們不愿意在人民群众中进行积蓄革命力量的艰苦工作，幻想中国革命可以在一个早上取得胜利，蒋介石的反革命国家机器只要经过一次“决战”就可以被根本打碎。“左”倾冒险主义，实际上并不能达到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目的，并不能真正壮大革命的力量。相反，这种盲目行动，只能招致革命力量和革命阵地的削弱。毛澤东同志在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年的十年内战时期，不断地反对了这种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綫，強調地指出必須注意在农村中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巩固的基础，“以求自立于不败之地”。毛澤东同志认为，首先使开始数量还是不多的农村小块根据地坚持下来，并且继续扩大，继续发展，就能够“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毛澤东同志在一九三五年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胜利，在当时革命力量削弱到只剩下十分之一的情况下，迅速地重振起来，保证中国革命走上了健全发展的道路。

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論，毛澤东同志把中国革命的目标集中在打碎蒋介石的反革命国家机器这一点上。如果没有打碎蒋介石的反革命国家机器，就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統治，就不可能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就不可能进行任何社会政治改革，更不可能使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毛澤东同志总结全部中国革命胜利的經驗說：

“总结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須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們的公式，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①

什么叫专政？誰如果不愿意耍弄欺騙的把戏，那就会承认馬克思列宁主义历来

^① “論人民民主专政”。



指出的这样一个真理，即列宁所说的：“专政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对整个社会实行统治，而且是直接用暴力来统治。”^①有各种不同性质的专政。最根本的区别是：少数剥削者对绝大多数被剥削群众的专政，还是绝大多数被剥削群众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奴隶主、封建主、资产阶级的专政，尽管形式上有差别，但是都属于前一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在不同的国家内也会有不同的形式，但是总归是后一类专政。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是民主革命的专政，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几个革命阶级的专政，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走狗、买办阶级、封建阶级的专政。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民主专政开始具有新的性质，实际上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专政，是无产阶级的专政。

任何一个专政，如果不直接凭借暴力，就不能实现，也不能维持。反革命的专政是这样，革命的专政也是这样。什么是暴力？这就是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工具，但是——难道可能不是这样吗？”

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

这样，事情是很清楚的：中国人民要推翻反革命的统治，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必须有人民的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这样说过：“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

^① “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第六节。



中国人民在长时期中所进行的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就是不断地摧毁反革命的军队、建立革命的军队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打碎反革命的国家机器、建立革命的国家机器的过程，就是不断地缩小反革命统治地区、扩大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过程。

毛澤东同志在上述同一篇文章中说：“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又说，在那些国家，“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但是，中国是处在另一种条件下。照毛澤东同志说来，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并没有议会可以利用，也没有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这种战争主要地是农民战争，这种军队是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军队。

我们共产党人知道，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议会也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装饰品。不了解这一点，是很愚蠢的。当然，无产阶级的政党如果在必要的条件下，不去利用议会这个工具进行合法的斗争，那也是蠢事。在中国，我们说没有议会可以利用，我们的主要斗争形式是革命战争，我们的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这绝不是说，不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去进行合法的斗争，如果这样想，那也是愚蠢的。可是，在十年内战时期，我们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就作了这样一些蠢事。

把革命斗争局限于合法的斗争，或者完全拒绝利用那种可能的和必要的合法的斗争，都是错误的。毛澤东同志从来严厉地批评这些错误。

毛澤东同志一直认为，革命的政党应当抓住各种时机，尽量地利用敌人的矛盾，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势力。他反对了各种片面性。他说，我们



的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①。但是，在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者采取了一种极端片面性的错误政策。他们不是把反动派当作主要打击的对象，而是把中间力量叫作“最危险的敌人”，当作主要的打击对象。他们不承认反动阵营内部的矛盾，更不承认中间势力同反动统治之间的矛盾。他们的公式同陈独秀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采取的右倾机会主义公式相反。在那时，陈独秀的公式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在这时，“左”倾机会主义的公式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左”倾机会主义者拒绝利用一切合法斗争的机会。结果，他们所采取的政策不是孤立了反动派，而是孤立了自己。原来犯过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王明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承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他们所接受的是陈独秀的老公式：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王明曲解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一战线政策，忘记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联盟的时候，必须无条件地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独立性”的重要指示^②。王明否认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方针，不赞成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也不赞成扩大和发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和抗日根据地，而把中国的主要希望寄托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主张把人民武装、抗日根据地和人民团体都“统一”于国民党，即放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国家机器的“统一”控制之下。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及其所采取的方针路线的特点，就是不触动并且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国家机器。他的结论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不能是人民的天下，仍然只能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天下。

在抗日战争中，两种国家机器，起了两种完全相反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人民政权，是全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要动力，是全国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国家机器所起的作用，则只能是削弱、

① “论政策”。

② 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



籍制和絞杀人民的抗日力量。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和摧毁革命人民的国家机器，而革命人民的神圣任务，就是保卫、发展和强化这个革命的国家机器，以达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在随后打倒那敢于向革命力量进攻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目的。这是两个中国命运、两个中国前途的斗争。

以毛澤东同志为代表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路綫，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傾机会主义路綫的斗争，在实际上，也就是关于两个中国命运、两个中国前途的斗争。如果实行了王明的右傾机会主义路綫，中国人民即使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就只能落在蔣介石的手上，中国人民就不能够在全国范围内争得自己的統治权力，就不能够粉碎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代替日本帝国主义的地位的狂妄計劃。反之，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坚持了毛澤东同志所提出的正确路綫，使人民解放軍和人民解放区不断地壮大起来，这就不但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且保证了在日本投降以后，能够迅速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蔣介石的反革命进攻，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和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支持下，取得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偉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澤东同志在同右傾机会主义斗争的时候，反复地說到以下的真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①

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嗎？

从日本帝国主义者投降以后到蔣介石发动新的全面的反革命的內战以前，中国共产党曾經和蔣介石进行了多次的談判。毛澤东同志曾經亲自到重庆，同蔣介石直接談判，成立了有关和平建国的協議。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簽訂的“国共代表会談紀要”，第一条就是“关于和平建国的方針”，其中明文規定“坚决避免內战”。但是，在这个协定簽訂后的第三天，即十月十三日，蔣介石就秘密地頒发了向解放区进攻的所謂“剿匪”命令。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政治协

^① “‘共产党人’发刊詞”。



商會議閉幕，但是不到十天，在二月十日，就发生了国民党特务在重庆較場口破坏庆祝政协大会的行凶事件。从一九四六年一月到六月，国共双方曾經三次成立了停战協議，但是，每一次協議，都随即被蔣介石更大規模的軍事进攻所破坏。

从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开始，經過抗日战争，直到一九四六年，蔣介石对共产党和人民的代表作过大量的动听的諾言，不但承认了要避免內战，而且公开承认要停止国民党的特务活动。但是，他总是一方面同意成立協議，向人民发出諾言，同时又采取同協議和諾言根本違反的行动。所有的協議和諾言，都被反动派当作进行反对人民的新步驟的烟幕，在他們认为不需要的时候，都是可以随时撕毀的。

馬克思列宁主义反复地指出这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反动派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毛澤东同志說：“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①他在一九四八年底所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对蔣介石破坏談判、撕毀協議的历史，作了以下的回忆：“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談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會議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盜匪曾經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們建立國內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願望改变了他們的階級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絲沒有呢？这些盜匪的历史，沒有那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驅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嗎？”国民党反动派堵死一切用和平方法进行社会政治改革的可能道路，总是把內战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蔣介石时常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你交出軍隊，我就給你民主，让你参加政权。右傾机会主义者对蔣介石的这些話听得很有味道，很感兴趣。相反，毛澤东同志經常告訴我們，不能上蔣介石这个当。难道在蔣介石反动派不断加强他們的反革命国

①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們的方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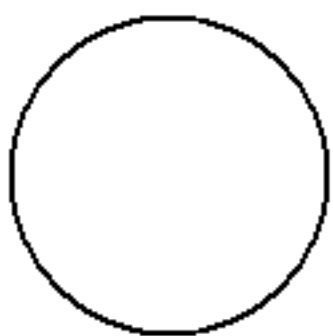


家机器的条件下，能够和平地获得民主嗎？能够和平地获得政权嗎？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右倾机会主义者，不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創造者，看不见人民群众的偉大力量，只看见蔣介石反动派的貌似强大的現象，看不见他們的軟弱的本质。右倾机会主义者对蔣介石国民党的幻想，实际上是被他們貌似强大的力量所吓倒。馬克思列宁主义者鄙視右倾机会主义者这种軟弱无能的态度，而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在于揭露反动派的外强中干的真相，鼓舞人民群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毛澤东同志正是执行了这样的任务。当蔣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将他的军队发展到四百多万人，即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国家机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毛澤东同志却深刻地指出，蔣介石反动派不过是紙老虎，中国人民应该准备，而且有能力，推翻蔣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統治，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使自己成为国家的主人翁。

事实的发展正如毛澤东同志的預言，蔣介石所率領的龐大的反革命军队，在人民解放军的打击之下，在三年多的時間内就迅速地崩潰了。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武装斗争中，总是不断地总结經驗，逐步前进。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澤东同志在一九四六年九月所写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同年十月所写的“三个月总结”，一九四七年九月所写的“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同年十二月所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九四八年三月所写的“关于情况的通报”，同年十一月所写的“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等等文章，在革命战争的各个发展阶段，及时地总结了經驗，指导革命战争一步一步地取得了胜利。毛澤东同志根据中国长期革命战争的經驗，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进一步地具体化了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全部消灭国民党军队的目的。人民解放军，愈战愈大，愈战愈强；蔣介石的军队，愈战愈少，愈战愈弱。由于国民党反动军队主力的消灭，国民党反动政权也就随之崩潰。



列宁在同叛徒考茨基争论的时候，这样指出过：“没有一个大革命是不‘瓦解’军队的，而且不这样也不行。因为军队是保护旧制度的最顽固的工具，是维护资产阶级纪律、支持资本统治、保持并教育劳动者去作资本的奴隶的最坚固的柱石。”^①列宁这里所说的就是：不瓦解旧的反革命的军队，不打碎这个反革命的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被压迫阶级就不可能取得自己的解放，就不可能取得自己的统治地位。列宁这些话，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写的，离开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但是，能不能说这些话是过时了呢？当然不能这样说。在伟大十月革命以后的四十多年内，又有欧亚一系列国家的革命的經驗，中国人民大革命的經驗，以及现在各国人民正在进行着的各种革命斗争的經驗，都越来越明显地证明了和证明着列宁这些话并没有过时，越来越明显地证明了和证明着列宁这些话所表达的真理的生命力。

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取得政权，打碎旧的反动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革命的国家机器，这是一件事。在取得了政权之后，依靠这个政权，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又是一件事。这是不能混同的两件事。必须有前者，才能有后者。这一点，在苏联是这样，在欧亚各社会主义国家是这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这样。

如果把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同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用和平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两件事混同起来，就是一种糊涂观念。这种糊涂观念，掩盖了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即是列宁所反复阐明的：“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历史上，各国人民的革命，都是出于人民的要求，都是阶级斗争发展的结果。这些革命，是一个国家之内某些被压迫阶级推翻某些压迫阶级、某些被剥削阶级推翻某些剥削阶级的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认为，革命不能输入，也不能输出。那种认为革命可以输入或者可以输出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帝国主义者和

^①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各国反动派正是这样来誣蔑各国人民的革命，但是，这种誣蔑并不能阻止各国革命运动的前进和各国革命的发生。

任何一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都不主張社会主义国家用国与国之間的战争来推广革命。南斯拉夫铁托集团誣蔑社会主义国家要用“国与国之間的战争”来推广革命，这不过是為帝国主义效劳的一种胡說。

各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和革命的胜利，是制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根本因素。中国人民大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进一步地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的力量，进一步地壮大了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大大地挫折了帝国主义者企图发动新的世界战争的冒险政策和冒险計劃。社会主义陣营越是强大，各国人民革命运动越是发展，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越多，世界和平就越有保障。現代修正主义者和某些糊涂人，把各国革命同世界和平对立起来，說要保卫世界和平就不能进行革命，这个观点，是完全荒謬的，是根本違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

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說，一百多年来一直照亮着人类前进的道路。在四十多年前，在偉大的列宁的领导下，无产阶级首先在世界的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取得革命的胜利。正如毛澤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所說的，經過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树立了全世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信仰。到現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在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和三分之一的人口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完全不可抵抗的。

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同时在全世界一切国家中一下子得到胜利，而会由于各国社会內在的原因，各国人民自己的觉悟，自己的努力，自己的革命准备，分別地逐步地得到胜利。各国人民必将經過自己的斗争，經過自己的手，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說的指导下，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資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必将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必将胜利的学說的指导下，最后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社 論——

偉大十月革命的道路 是全人类解放的共同道路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到来了，我們热烈地庆祝全人类的这个偉大光輝的节日。四十三年前，在偉大革命导师列宁的领导下，俄国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繼續巴黎公社的事业，举行了武装起义，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統治，取得了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偉大胜利；接着进行了三年的英勇斗争，粉碎了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消灭了国内的反革命叛乱，保卫了十月革命的偉大胜利。正如列宁所說的：“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輝煌的胜利”^①。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极其偉大极其深刻的革命。这次革命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次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紀元，从此以后，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主导的新的世界革命开始了。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經過許多年的努力，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把落后貧困的俄国建設成为一个先进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成为打败德国法西斯的主力，帮助东欧各国的人民赢得了自己的解放，帮助亚洲各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大大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的发展。現在，苏联进入了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設的历史时期，苏联人民以自己創造性的劳动，正在順利地执行宏偉的七年計划，苏联的經济建設和科学技术等都得到了飞跃的发展。

① “苏維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9頁。



世界各国人民，从苏联人民所获得的成就中，一天比一天明显地看到自己的将来。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来讲，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历史事实无数次向我们证明：不通过革命手段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不可能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真正解放。列宁曾经再三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之点，“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阶级（以及大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①列宁还不断地指出，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就要求党深入到千百万工农劳动群众中间去，以主要的精力领导群众进行斗争，不断提高群众的革命水准，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进行长期的、细致的、顽强的准备工作，把争取无产阶级目前利益的斗争和争取长远利益的斗争结合起来，反对为了迁就目前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错误倾向。列宁在领导革命中，自始至终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而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及其俄国伙伴——孟什维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十月革命前夕，这些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拼命反对俄国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在十月革命之后，他们又竭力反对把苏维埃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组织，反对解散资产阶级的反动的立宪会议，反对击溃和瓦解反动军队，等等。列宁强调指出：“问题的本质在于：是保存旧的国家机器（它与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浸透了因循守旧的恶习）呢，还是把它破坏并用新的来代替它。革命不应当是新的阶级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指挥、管理，而应当是新的阶级打碎这个机器，利用新的机器来指挥、管理，——这就是考茨基所抹杀或者是他所完全不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②

俄国革命所面临的敌人曾经显得很强大，这里不仅有俄国的地主和资产阶级，而且有国际帝国主义。当时有许多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以为，俄国无产阶级想要发动起义、夺取国家政权，是一种毫无胜利希望的幻想。但是，和一切庸人相反，列宁在革命危机成熟的时候，坚决地、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夺取国家政权的任务，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实际地做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惊天动地的事业。列宁在十月革命

①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9页。

② 同上，第473页。



爆发的前夕，写出了“国家与革命”这部伟大著作，从理论上保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思想，进一步详尽地阐明了巴黎公社的道路，为俄国无产阶级争取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奠定了巩固的理论基础。这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全人类解放事业是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的。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胜利。十月革命在整个历史上的伟大意义，愈到后来，就愈加明显。四十多年的时间非但没有使十月革命所证实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真理丝毫减色，反而使这个真理不断地得到新的证实，在实际生活中节节地获得胜利。继俄国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后，又在欧洲亚洲的一系列国家中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证明，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才能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同时，被打倒的资产阶级总是企图复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影响还很大。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存在，也使无产阶级专政面临着长期的、严重的斗争任务。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必须不断地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总结了近一百年特别是近四十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宣言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条主要的普遍规律。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否认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竭力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正是想避开无产阶级解放的这条康庄大道。因此，一切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坚决反对修正主义，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

和四十多年前比起来，世界局面极大地改变了。社会主义已经在占世界人口三



分之一以上、占土地面积四分之一的地区取得了胜利。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在互相支援、密切合作之下，正在胜利地建设着社会主义，获得共同的经济高涨。在社会主义力量和全世界进步力量的支持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得到了猛烈的发展。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运动和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运动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这些变化，帝国主义的地盘一天一天缩小，帝国主义体系内的各种矛盾正在日益尖锐化，它们的日子很不好过。现在的世界局势表明：我们正处在和平力量压倒战争力量，人民力量压倒反动力量，社会主义力量压倒帝国主义力量的新时代；正处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空前有利的新时代；正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空前有利的新时代；正处在帝国主义制度进一步加速崩溃，全世界人民的胜利和觉醒不断地向前发展的新时代。现在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结成最广泛的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坚决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坚决地反对殖民主义，促进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促进帝国主义国家内劳动人民反对好战集团和垄断资本的革命斗争的发展，以达到制止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目的。

帝国主义决不会心甘情愿地死亡。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扩军备战，到处维持民族压迫和民族奴役制度，到处扶植反动统治和反动力量，并且处心积虑地阴谋颠覆社会主义国家。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保卫世界和平、争取人类解放的坚强堡垒。继续发展壮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神圣职责。中国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为履行这个神圣职责进行最大的努力。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现代修正主义者，使用一切卑鄙伎俩来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可是他们的一切破坏活动总是可耻地遭到失败，今后也必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下去。

四十多年来，社会主义欣欣向荣、帝国主义日趋没落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全世界人民都将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会建设起无限美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社会。

伟大的十月革命道路万岁！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辯証法是革命的代数学

——讀“毛澤东选集”第四卷

邓力群 吳江

一、“最銳利的武器”

辯証法是“革命的代数学”，这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的名言。列宁在评价赫尔岑的时候，非常称赞这句名言。

馬克思、恩格斯认为，唯物辯証法是“本质上批判的和革命的学說”^①，是“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銳利的武器”^②。列宁說：“用唯物辯証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辯証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③。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运用唯物辯証法，深刻地揭露和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帝国主义制度的矛盾，并且根据这种分析，正确地制定了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斗争、争取革命胜利的战略和策略。列宁曾經譏笑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对于辯証法一窍不通，說他們“用折衷主义和詭辯术代替辯証法”^④，“用‘素朴的’（而且是平静的）‘进化論’去代替‘狡猾的’（而且是革命的）辯証法”^⑤。他們害怕揭露矛盾，不敢对社会发展过程作任何革命的分析；他們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他們是些畏首畏尾的改良主义者，唯恐离开资产阶级一步，更怕跟资产阶级决裂，总是为了謀取眼前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毛澤东同志是中国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最偉大的代表和領袖，他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辯証法，深刻地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同时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丰富經驗，进一步地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辯証法。

① “資本論”第1卷第二版跋。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第436頁。

②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58頁。

④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04頁。

⑤ “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頁。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我国武装的革命和武装的反革命进行决战的时期。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三年多的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赢得了人民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就是这个伟大胜利的经验结晶。收集在这一卷里的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一样，都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革命光辉，进行着反对各种背离唯物辩证法的错误倾向的斗争。毛泽东同志根据革命辩证法的要求，或者说“革命代数学”的要求，把严格的科学精神和高度的革命精神结合起来，把伟大的冲天干劲和巧妙的斗争艺术结合起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进一步地结合起来，制定了这个时期的一整套路线和政策，最完备地发展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并且进一步发展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

二、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列宁常说，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本质，是辩证法的核心。毛泽东同志在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时候，始终坚持着列宁的这个根本观点，总是从观察和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出发，来找出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毛泽东同志在观察和分析矛盾的时候，和一切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样，不但注意认识和研究的普遍性，尤其注意认识和研究的各个事物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矛盾的特殊性。

近代中国是东方许多矛盾的集中点。在长时期中，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同志研究了这个问题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的特殊性，明确地指出，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民主革命，已经不是旧的、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而是新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毛泽东同志同时又研究了这个问题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个发展阶段的特殊性。指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过了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七年的国内革命战争、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和一九三七年以后的抗日战争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他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过程中，上述基本矛盾的性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这个基本矛盾在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基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中国革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揭露和分析了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基本矛盾在这个新阶段中的新的特点。他说：

“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①

从这个总的估计出发，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矛盾，已经转变为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矛盾。美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组成帝国主义和反民主的阵营，反对以苏联为首的一切民主势力，妄图把中国变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并且以此作为它实行奴役世界的侵略计划的一个重大部分。在美帝国主义看来，夺取了中国，不但可以独霸亚洲，而且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为了实现它这个狂妄的计划，美帝国主义出钱、出枪，指使蒋介石反动派策动和进行全国规模的内战，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反动派代替日本帝国主义走狗汪精卫的地位，成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走狗。这个反动集团在抗日时期，由于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保存和增加了它的军事力量，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它又接受了日本侵华军队一百万人的全部装备，收编了全部伪军，得到了美帝国主义在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巨大援助，因此使它的军事机构膨胀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个反动集团是中国大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它的经济基础，是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者说，官僚资本主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政的二十年中，集中了巨大财产，在抗日战争以后，又接受了敌伪的全部资产。这个官僚资本的独占集团和美国的独占资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控制着全国的经济命脉，严重地束缚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同志概括地指出：在现阶段，“革命所要推翻的敌人，只是和必须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些敌人的集中表现，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②

同这些敌人站在对立方面的，这个阶段的革命力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毛泽东同志说：“所谓人民大众，是指一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的人们，也即是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上明确地指出的工、农、兵、学、商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在宣言上所說的‘学’，即是指一切受迫害、受限制的知識分子。所說的

①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30页。

②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11—1312页。



‘商’，即是指一切受迫害、受限制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中小资产阶级。所说的‘其他爱国人士’，则主要地是指的开明绅士。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即是由这些人团结起来，组成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而又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革命。”^①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的革命力量，经过八年抗日战争的艰苦锻炼，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有了一亿多人口的解放区，有了一百多万人民解放军，有了二百多万民兵。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独立、和平、民主的主张，在全国的影响愈来愈大，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反对卖国、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呼声愈来愈高。同时，我们的斗争在国际上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支持，得到了各国广大人民的支持。

根据这种对矛盾双方特点的分析，对敌我双方特点的分析，毛泽东同志指出：“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地位，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他们就宣布他们自己和全国人民为敌，他们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放在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使这个斗争迅速发展下去。全国人民除此以外，再无出路。”^②这也就是说，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已经发展到空前尖锐的程度，已经进到一个总解决的阶段。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斗争，已经进到一个最后决战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敢不敢彻底地揭露这个矛盾，敢不敢彻底地解决这个矛盾，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最彻底地揭露了这个矛盾，最坚决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来解决这个矛盾。不论在军事上敌占优势、我占劣势的时候，或者在军事上我占优势、敌占劣势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对这个矛盾的揭露和解决，都充分地表现了革命的彻底性和革命的坚决性。

在敌占优势的时候，例如，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根据历史的经验，尖锐地揭露了蒋介石反动集团极端残忍、极端阴险的反动本性，并且针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方针，提出了我们的“针锋相对”的革命方针。

他说：“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又说：“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

^①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85页。

^②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24页。



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①

在我占优势的时候，例如，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揭露美蒋反动派为着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的阴谋，并且针对这个阴谋，提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

他说：“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又说：“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②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③毛泽东同志就是遵循列宁的这个原理，揭露了中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一方，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为另一方的对抗性的矛盾，考察了矛盾双方的演变，进一步证明了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暂时性和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帮助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能够用革命的行动打碎国民党的反动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毛泽东同志彻底地、坚决地发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革命精神。同一切腐朽无能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者相反，他不是主张缓和人民大众和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阶级斗争，而是坚定地站在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立场上，主张把这种阶级斗争进行到底，不是实行调和人民大众和国民党反动派利益的改良主义的政策，而是毫不动摇地执行坚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26—112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79—1380页。

③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05页。



三、形势发展的两种可能性，革命政党的两手政策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的矛盾，是不能不解决的矛盾。那末，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经过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式，来解决这个矛盾呢？

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整个形势的分析，认为解决这个矛盾有两种可能的道路，两种可能的方式。一种可能是，在国内外的强大压力下，经过和平谈判，迫使国民党有条件地承认我党的地位，同时我们党也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因而造成国共两党（加上其他民主党派）和平合作的局面，通过和平的道路，逐步实现中国社会政治的改革。另一种可能是，爆发全国规模的内战。蒋介石反动派一贯坚持卖国、坚持反革命内战、坚持反革命独裁的方针，他们把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愿望，力争和平反对内战的一切努力，看作是胆怯和力量薄弱的表现，在美帝国主义的大力援助下，发动全面内战，妄图消灭中国人民的一切革命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不迫使中国人民用革命战争来反对反革命战争，并把这个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彻底摧毁国民党的反动政权。

根据这种全面的估计，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党的方针是，力争实现前一种可能，同时准备应付后一种可能，并且把全部工作的基点，放在壮大人民力量、应付最坏可能的上面。这是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法，全面地估计时局发展和正确地制定党的方针的最好的范例之一。他总是根据事物发展的内部矛盾，全面地看到事物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反对片面地承认一种可能性，而否认另一种可能性。他深刻地指出，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正是为着争取较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成为现实性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

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候一再提醒全党，要记取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他说：“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我党还是幼年的党，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以致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跟着就失掉了，人民遭受了长期的灾难，光明的中国变成了黑暗的中国。这一次不同了，我党已经有了三次革命的丰富经验，党的政治成熟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了。党中央再三再四地讲明内战危险，使全国人民、全党同志和党所领导的军队，都处于有准备的状态中。”^①毛泽东同志这段话，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准备，不做应付最坏可能的准备，突然事变一旦发生的时候，困难局面一旦来到的时候，就会使我们处于软弱无能的被动地位，会手足无措，难于对付，以致使革命遭到失败。相反地，有了准备，做了应付最坏可

^①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26页。



能的准备，我们党就能够在任何局面出现的时候，都处于主动的地位，都立于不败之地，完全有办法来对付任何复杂和困难的情况，争取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武装了全党，提高了全党干部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使我们在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实现国内和平的时候，随时警惕内战的危险，使我们的干部避免了因为要争取和平而忽视内战可能的片面性。针对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进行“和平”欺骗，一方面策动军事进攻的反革命的两手，我们党采取了革命的两手，这就是，一方面，经过谈判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玩弄“和平”的阴谋，一方面，坚决打退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这样就胜利地应付了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一边谈一边打、这里谈那里打、今天谈明天打、谈了又打打了又谈的复杂局面，保卫了人民已经得到的胜利果实，并且保持了近一年的国内基本和平的局面。在全国内战爆发以后，我们党在用自卫战争彻底粉碎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同时，也不拒绝进行无损于人民根本利益的谈判，凡能和平解放的地方，例如北平、绥远、长沙、昆明、四川西部、新疆和西藏，我们都没有放过一切可能的机会，努力做了争取、接洽和谈判的工作，实现了这些地区的和平解放。这样也就使我们的干部避免了另一种思想上的片面性，这就是在用革命战争打倒敌人的时候，忽视在局部地区用和平方式实现解放的可能性。

国民党反动派的目的，是要坚持独裁统治，要消灭中国共产党，消灭人民军队，消灭人民政权。他们进行反革命内战，固然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被迫同我们党进行谈判，也还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认为，即使不能经过谈判使我们拱手交出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至少总可以借此骗取政治资本和赢得准备全国内战的时间，或者获得喘息的时间。敌人的手法会随着斗争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他们坚持独裁、消灭共产党的反动本性永远不会改变。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是为了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企图经过和平谈判保存它的残余力量，我们党看穿了 this 阴谋，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和谈的八个条件，其目的也是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派的国家机器及其主要的工具——反动军队。这就是说，不论是经过国内革命战争方式，还是经过和平方式，归根到底，都必须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即国家政权问题。

四、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策略上重视敌人

正确地认识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正确地估计形势，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我们的战



略思想和策略思想，这是革命事业胜利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

毛澤东同志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的时候，曾经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①又说：“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②在这里，毛澤东同志辩证地解决了在军事上敌处优势我处劣势的情况下如何使战略思想和策略思想统一起来的问题。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澤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新经验，继续发展了这个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是世界上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搏斗的一个焦点。世界各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为了把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大力支持蒋介石反动派，妄想用规模空前浩大的反革命内战来压倒中国人民。正当敌人“声势汹汹，不可一世”的时候，毛澤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蒋介石和它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③与此同时，毛澤东同志又特别强调在军事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反对那种在战役部署上轻视敌人、平分兵力，以致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的错误倾向；强调在政治上要注意利用敌人矛盾，分化敌人和孤立敌人，要努力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那怕是暂时的同盟者；他指出在同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必须进行艰苦的工作，逐步地积蓄力量，逐步地消灭敌人。

毛澤东同志把这些思想概括起来，形成了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和在策略上重视敌人这样一个著名的概念。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战略和策略的辩证关系的一个创造性的新概括，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战略和策略理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新发展。他说：

“反对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例如，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到国民党区域作战，惧怕消灭买办封建制度、平分地主土地和没收官僚资本，惧怕长期战争等。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已经腐烂，没有前途。我们有理由轻视它们，我们有把握、有信心战胜中国人民的一切内外敌人。但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不论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或思想的斗争），却又决不可轻视敌人，相反，应当重视敌人，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当着我們正确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第220页。

② 同上，第222页。

③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92—1193页。



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阶级，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一般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绅士），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①

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和在策略上重视敌人的思想，是建立在新生力量一定战胜腐朽力量的坚定信心之上，建立在反动派外表强大、本质虚弱的科学分析之上，建立在对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到整个质变这一规律的深刻认识之上的。毛泽东同志认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从本质上看，从全体上看，从长期上看，我们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是纸老虎，敢于同它们斗争，敢于夺取胜利。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从每一个局部上看，从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是会吃人的，我们必须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必须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毛泽东同志运用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和在策略上（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个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辩证地解决了人民革命战争中用劣势兵力（就数量来说）战胜优势兵力的一系列的重大问题，科学地制定了我军作战的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他指导全军坚决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他指导我军在战略防御中进行战役进攻，在战略上的内线作战中进行战役上的外线作战，在战略持久中进行战役速决。“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②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始终应用这一战略上藐视敌人和策略上（战术上）重视敌人相结合的辩证思想，去同敌人和各种困难作斗争，并且同违反这一思想的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进行了不断的斗争。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都不承认事物固有的两重性，不懂得斗争过程的辩证法，而使自己的认识陷于以下的这两种片面性：一种片面性

①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67—1268页。

②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47页。



是，只看到敌人外表强大、人民革命斗争的道路还很艰苦曲折，就不敢领导人民跟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采取投降主义的路线，一味宣传妥协理论，甚至认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把敌人看做纸老虎，是一种“冒险主义”、“盲动主义”的观点。另一种片面性是，只看到敌人本质虚弱、革命必然胜利，因而不做艰苦的组织工作和积蓄力量的工作，在对敌斗争中采取轻率态度，甚至认为，在策略上（战术上）重视敌人，对敌人的战争阴谋提高警惕，是对于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对于自己的力量估计不足，等等。就是说，他们都各自把一个片面绝对化，把片面夸大成为整体，把整体从属于片面。他们把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和在策略上（战术上）重视敌人，看成是绝对不能相容、绝对互相对立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既然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就应该在策略上（战术上）也藐视敌人；或者，既然在策略上（战术上）重视敌人，就应该在战略上也重视敌人。他们认为，要藐视就不能重视，要重视就不能藐视。形而上学的头脑使他们不能理解：矛盾的东西存在着统一性，而统一的东西是存在着矛盾的。他们不懂得藐视和重视的区别及联系，实际上也不懂得战略和策略的区别及联系。

五、对朋友采取团结和争取政策，对敌人采取分化和孤立政策

严格区别敌我界限，具体区别敌人内部和人民内部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不同情况，根据这些客观存在的区别，建立我们的正确政策，这是毛泽东同志一向十分重视的问题。

如前所说，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以后，国内敌我双方的力量发生了一个新的组合。毛泽东同志根据“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①这一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对于这一新的组合，进行了深入的具体的分析。他指出：由于美蒋反动派和全国人民为敌，它们的罪恶和一切欺骗已经越来越被它们自己的行为所揭穿，它们对解放区大举进攻，进行残酷的内战，同时用刺刀向着国民党统治区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人民，从而使它们自己陷于完全孤立的地位。相反的一方面，由于我党采取坚决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和保护群众利益的正确方针，越来越受到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因此，这一时期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不是比过去缩小了，而是比过去真正地扩大了。革命的人民，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等等，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了。毛泽东同志由

^①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7页。



此得出了一个基本的結論：反动派只有一小撮，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人；革命人民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我們的任务，就在于团结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结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去战胜这一小撮反动派。我党正确的战略和一整套的策略和政策，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要取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的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毛澤东同志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中间，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是主体；同时还包含民族资产阶级和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开明绅士等。我們要壮大人民大众力量，战胜反动派，首先和主要的，是要依靠劳动群众，充分发挥劳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把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性充分发动起来，才能造成几万万人民自己起来解放自己的真正人民大革命，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否則，就不会有真正的人民革命和斗争，当然更不会有什么人民革命战争。在过去中国的几个革命阶段，都曾出现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錯誤，那就是把人民大众的主体和人民大众的其他力量弄颠倒了，信任资产阶级和从敌对营垒中分裂出来的人，超过信任工农劳动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或者不允許劳动群众起来革命，而企图依靠资产阶级和从敌对营垒中分裂出来的人来达到革命的目的，并散布諸如此类的幻想。这是完全錯誤的。如果按照这种錯誤的做法，那就不可能找出解决革命和反革命的矛盾的正确办法，同样也不可能找出处理统一战线内部矛盾的正确办法。因为不充分发动和壮大革命的主体力量，也不可能真正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不发展进步势力，也不可能争取中間势力；不巩固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也不可能建立和巩固劳动人民同可以团结的非劳动人民的统一战线。

但是，只要主体力量而不依靠这个主体力量去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不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紧密地团结起来，不把主要的敌人孤立起来，这也是完全不对的。这是一种“左”的片面性，是从“左”的方面抛棄解决革命和反革命矛盾的正确方法。毛澤东同志在这一时期，特別在这一时期的后期，着重地糾正了这种从“左”的方面来的片面性，主要是侵犯中农利益和侵犯工商业的錯誤。他強調在农村中要依靠貧农，巩固地团结中农，保証参加土地改革统一战线的人数（戶数）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他指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不仅应当在政治上争取他們，还必須在經濟上照顾他們；并且认为，团结开明绅士是一个必須注意的問題。



为了正确地解决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又必须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主要是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我国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参加人民民主革命，或者对革命守中立。这个阶级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革命性；另一方面，妥协性和动摇性。我们对它采取的政策，也包含两个方面，即对于它的革命性，是团结的政策，对于它的妥协性和动摇性，是批评和斗争的政策，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这就是说，既有统一的方面，又有矛盾的方面。看不到这个阶级的两重性，在相互关系中只看到矛盾的方面而看不到统一的方面，因而否认团结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就会产生“左”的片面性；同样，看不到它的两重性，在相互关系中只看到统一的方面而看不到矛盾的方面，因而否认斗争的必要性，则会产生右的片面性。毛泽东同志指出，从我党的历史情况看，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时候，党内容易产生右的片面性，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产生“左”的片面性。

我们不仅要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而且要分析民族资产阶级内部左、中、右各派的不同情况。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对美蒋反动派增长了不满和仇恨，他们的左翼分子愿意同共产党合作，右翼分子则依附于国民党，其中间分子则在国共两党之间采取犹豫和观望的态度。事实完全证明，为了有利于解决革命和反革命的矛盾，在对待这个阶级的关系上，在坚持团结的政策的同时，又必须进行必要的斗争。如上所述，我们在这一时期坚持了对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严肃地纠正了某些地方违反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左”的错误。另一方面，我们决不是一味迁就，放弃批评和斗争。在当时，为了争取这个阶级参加反美反蒋统一战线，曾经同这个阶级中那些主张“第三条道路”的人，进行过一次极为重要的严肃的斗争。那些人一方面表示不赞成蒋介石的反革命道路，另一方面又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道路。他们所主张的道路，实际上是有利于蒋介石反动派的道路，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同主张这条道路的人进行斗争，归根到底是关于要不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承认不承认工人阶级对于国家领导权的问题的斗争。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分子，更必须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他们的消极、反动方面进行必要的严肃的斗争。这些右翼分子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倾向，他们替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散布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不彻底揭露这些右翼分子的反动性，不坚决打击他们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而对他们一味妥协迁就，甚至替他们涂脂抹粉，使群众增加对他们的幻想，这是一种右的错误。这样做也完全不利于争取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但是，即使是对于这些人，政治上的打击和经济上的消灭也是两件事，如果混同



这两件事，也会犯“左”的錯誤。事实証明，只有坚持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才能有效地争取中間派。我們对反动派的斗争愈坚决，胜利愈大，也就愈容易争取中間派的人們。否則，不仅不能有效地争取中間派，还会使中間派更陷于动摇观望，直至向右摆，因而削弱革命力量，扩大反动派的力量。

为了解决革命和反革命之間的矛盾，我們必須充分利用敌人內部的矛盾，促使不到人口百分之十的一小撮人內部不断发生有利于革命的分化，使那些最反动的部分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我們要把敌人营垒中間的一切斗争、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敌人之用。这里，經驗也証明：只有向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才能使敌人內部的矛盾和分化越来越多，才有利于我們充分利用敌人內部的矛盾。否則，利用矛盾的可能性实际上会减少，而相反会給敌人以从容布置自己力量的机会。在这一时期，我們正是在对敌人坚决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的条件下，得以愈来愈多地并愈来愈成功地利用了敌人內部的矛盾，直至和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將領取得和平協議而使之归附于人民，因而使主要的敌人加速陷于孤立，加速遭到彻底的失敗。我們在利用敌人內部矛盾的时候，又必須注意巩固革命陣营，不容許坏人侵入。我們对于那些企图用混入革命陣营的方法以求保存和加强他們自己陣地的敌人，保持高度的警惕，“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①

以上种种，使我們看出，毛澤东同志是怎样依靠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辯証法，怎样运用客觀事物的对立統一規律，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进行具体的分析，得出正确的結論，制定正确的政策，使我們能够在复杂斗争中避免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始終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从而保證了革命的彻底胜利。

六、困难一批一批地克服，胜利一个一个地取得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胜利的过程，是由小半个中国的胜利，到半个中国的胜利，到大半个中国的胜利，再到全国的胜利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在已經取得的胜利的基础上，把旧中国最后变为新中国的过程。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领导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議上的报告”。“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37頁。



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的发展，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分成了各有若干性质区别的三个阶段。这就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六年六月，争取全国和平合作局面、准备应付全国内战的阶段；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七年六月，敌处战略进攻、我处战略防御的阶段；一九四七年七月到一九四八年夏，我处战略进攻、敌处战略防御的阶段；一九四八年秋以后，进入战略决战、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政府、取得全国胜利的阶段。经过革命战争，彻底推翻蒋介石反动派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中国社会性质的一个根本质变。这个根本质变是通过不断的量变完成的。在三年半的时间内，反动派的军队和政权一部分一部分地被消灭，人民革命的力量一步一步地得到发展，就是这一量变过程的表现。同时，在这个不断的量变过程中，也包含着许多的部分质变，因此使整个过程显出阶段性来，每个新的阶段同旧的阶段比较，都有若干性质的区别。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在每个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如果没有不断的量变，没有许多的部分质变，整个质变也不能来到。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人们如实地认识了、熟练地掌握了这个规律，就有可能在促进事物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伟大的主观能动作用。

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毛泽东同志是如何熟练地运用唯物辩证法，从实际出发，分析整个革命战争发展的规律，研究革命战争发展的过程，使他对革命战争的指挥，完全符合于客观的实际情况。而且每当客观过程已经从一个发展阶段向另一个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他总是善于使全党和全军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适合于变化了的新情况，及时地提出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从而推动客观过程的发展，引导革命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在全国内战开始的时候，敌处战略进攻、我处战略防御，毛泽东同志根据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分析，就断定：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毛泽东同志说：“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①为了实现打败蒋介石的目的，毛泽东同志不但规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而且制定了一年內平均每个月消灭敌人八个旅的作战计划，并且认为全部实现

^① “三个月总结”。《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03页。



这个计划是改变敌我形势的关键。战争打了一年，在敌军被我消灭了九十七个半旅以后，战争形势由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敌人的战略进攻被停止了，我军夺取了战略上的主动。除了人民解放军反对蒋介石进犯军的战线以外，这个时候，在国民党统治区又出现了反对蒋介石反动政府的第二条战线。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①

适应这种形势的变化，为着彻底粉碎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们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为着更直接地推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斗争、解放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提出了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这就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从此进入了我军战略进攻、敌军战略防御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在向全党全军号召完成第二年作战计划的时候，强调指出：“只要我军能如第一年作战平均每月歼敌八个旅，在第二年再歼敌九十六至一百个旅（七、八两月已歼敌十六个半旅），则敌军将进一步大受削弱，其战略性机动兵力将减少至极点，势将被迫在全国一切地方处于防御地位，到处受我攻击。”^②果然，在英雄的人民解放军经过又一年的作战，消灭了敌人九十四个旅之后，战争形势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东北、山东和陕北都恢复了绝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战线伸到了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的广大地区。同时，人民解放军在攻克一些重要城市的作战中，学会了攻坚战术，不仅能够打运动战，而且会打阵地战。大块大块的解放区连成一片，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人民解放军的兵力由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百二十万人，增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的二百八十八万人。而敌人的兵力则由一九四六年七月的四百三十万人，减少到一九四八年六月的三百六十五万人，其中用于第一线的，只占百分之七十，分布在很广的战线上，而且有不少是被我歼灭后重新补充起来的，战斗力很弱。所有这一切说明，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接近成熟。

毛泽东同志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时机，卓越地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敌军一百五十四万多人。毛泽东同志说：“至此，中国人民才开始吐了一口气。现在，情况已非常明显，只要人民解放军向着残余的国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攻击，全部国民党反动统治

①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23页。

② “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32页。



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现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的政策，业已自食其果，众叛亲离，已至不能维持的境地。”^①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土崩瓦解的形势下，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国民党残余军队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大举渡江以后，到一九四九年底，就消灭了中国大陆上的全部国民党军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结束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在国内，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和蒋介石反动派的矛盾解决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突出起来了。毛泽东同志预见到这种变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②

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同志怎样以极大的革命毅力和高度的领导艺术，把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不失时机地推进到战略进攻阶段，在战略进攻取得胜利以后，又不失时机地组织战略决战，接着又把革命胜利迅速彻底地推向全国。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又出色地解决了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问题，不间断地把中国革命的车轮推向社会主义的轨道。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样掌握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到整个质变的规律，把革命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高度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促进不断的量变，促进部分的质变，使革命能够不间断地又有步骤地前进，因而也就加速了革命的胜利。

七、力求认识的全面性，防止思想的片面性

在“矛盾论”里，毛泽东同志说：“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

①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93页。

②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34页。



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①

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每一篇文章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同志研究每个问题、解决每个问题，都是同这种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坚决地对立的。

毛泽东同志总是客观地、如实地研究分析实际情况和革命运动的发展变化，客观地、如实地表达这种发展变化，毫不带有任何的主观随意性，力求使自己的思想完全符合于外界客观的规律性，完全符合于客观世界的辩证运动。

毛泽东同志总是全面地观察和分析一切问题，反对“左”的片面性和右的片面性。在揭露和解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基本矛盾的时候，既看到了矛盾的普遍性，又看到了矛盾的特殊性。正因为他着重地、深刻地解剖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性，他也就更进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普遍性阐发出来了。他在分析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整个形势的时候，既估计到了争取国内和平局面的可能性，又估计到了爆发全国内战的可能性。正因为他把党的全部工作的基点放在壮大人民力量、应付后一种可能性方面，所以我们党就能够主动地胜利地应付各种严重的、复杂的局面。他把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和在策略上（战术上）重视敌人辩证地统一起来，反对了惧怕敌人的右倾机会主义，又反对了轻视敌人的“左”倾机会主义。他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既了解了反动派一方，又了解了人民一方；既了解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作为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一方，又了解了被领导的阶级、阶层一方；既了解了工农联盟一方，又了解了其他一切可能团结的社会力量一方；既了解了工农联盟中无产阶级一方，又了解了农民一方；既了解了农民中的贫雇农一方，又了解了中农一方；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既了解了它的革命性一方，又了解了它的妥协性一方，同时又对于它的左中右各派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如此等等。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样具体地、深入地分析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的具体情况，具体地、深入地分析各种事物的具体情况，看到每一种矛盾的全面和它的各个侧面。他正是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在认识任何事物的时候，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力求认识的全面性，防止思想的片面性。

正因为毛泽东同志总是客观地、全面地分析问题，所以他就能够透过事物的现象，深入事物的本质，深刻地认识事物本身的内部联系，从而找出事物运动所固有的规律，并且自觉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第300—301页。



地运用这种规律，去促进事物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说：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在既定的客观物质的基础之上，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就要发挥他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敌人，改变我们这个被侵略被压迫的社会国家的状态，造成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赞成任何一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但是我们必须提倡每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他们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①

在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的启示下，我们很多勇敢而明智的将军，就是像这里所说的一样，不但具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具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他们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导演出了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他们在战争的大海中运用熟练的游泳术，使中国人民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了彼岸，赢得了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

现在，我们正处在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为着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各个战线上和各个岗位上，都需要有愈来愈多的勇敢而明智的领导人员和干部，他们也需要像战争时期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一样，具有压倒困难的勇气和驾驭局势的能力，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出色的成绩来。可以预期，“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必将有力地推进我国人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潮，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必将大进一步地提高全党和全体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使他们更好地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去完成面临的各项任务。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第468页。



依靠群众，合理分配商品

——重庆市合理分配商品的经验

郑延石

一九五八年以来，重庆市商业部门，在中央和各級党委领导下，适应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新形势，在组织人民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充分依靠群众，对某些消费品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合理分配，既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又适当地满足了人们的不同需要，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依靠群众，有组织有计划地合理分配商品，是全面安排和组织人民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商业工作中群众路线的一项新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商品分配形式的一项新发展。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随着生产建设的迅速发展和街道工业的蓬勃兴起，重庆市的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从生产上组织起来了。在全市有劳动能力的居民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参加了各种力所能及的生产建设事业。整个城市出现了“处处忙生产、户户无闲人”的局面。由于生产的发展和就业人数的增加，一九五九年全市的工资总额，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百分之五点八六，今年上半年又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十一点五九。据沙坪壩区的调查，人民公社化以来，居民平均收入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左右。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城市人民的生活更加集体化了，

全市已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参加了公共食堂，并举办了大量的集体福利事业。这些变化，反映在商业方面，首先是人民的购买力提高很快，对消费品的需要，无论在数量上或品种上，都大大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商品供应量也有很大的增长（一九五九年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今年上半年又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五），但是，某些商品也难免发生某种程度的供需矛盾。例如今年上半年，重庆市销售的卷烟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十六，食糖增加一倍半，水产品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七，布鞋增加近两倍，毛衣增加一倍半，热水瓶增加百分之三十八，闹钟增加六倍，可是这些商品有时仍然不能充分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其次，城市中有劳动能力的居民，大部分参加了生产，他们按时上班下班，不可能在生产时间内到商店去购买消费品，因此在上班前、下班后和假日，就出现了排队购货的现象。购销时间的集中，使售货员照顾不过来，群众觉得浪费很多时间，购买很不方便。第三，城市人民生活集体化以后，集体消费单位增多了，集体购买的商品增加了。一九五七年，在消费品零售总额中，集体单位消费的比重只占



百分之二十八，今年上半年则上升到百分之四十四。所有这些，都要求商业部门采取有效措施，改进商品的供应方式，更好地为生产为消费者服务。重庆市商业部门，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经过实践，找到了一条依靠群众、有组织有计划地合理分配商品的正确途径，这就是根据货源和群众需要情况，通过群众讨论，议定分配办法，制定必要的制度，并由群众直接参加分配工作的群众路线的商品分配方法。

这种群众路线的商品分配方法，是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地发展起来的。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九龙坡谢家湾商店，为了支援生产大跃进，减少群众购货时间，组织售货员送货至居民地段，就地供应，便利群众。对于某些一时供应不足的商品，依靠居民组长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经过调查访问后，有的尽先分配给最急需的居民，有的挨户轮流供应。这种依靠群众合理分配商品的办法，不久就在全市普遍推广。同时，在全市居民地段，普遍地建立起由群众举办的代销店，供应群众日常需要的商品。以后，在几次节日供应中，大搞群众运动，吸收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参加商品分配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商品分配工作的经验，并逐渐建立起一套新的分配制度和体系。这样，就使合理分配商品的工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新的发展。目前，在全市消费品零售总额中，采用合理分配的办法来供应的商品，已经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

重庆市在进行合理分配商品工作中，取

得了以下几条主要经验：

一、从有利生产、便利群众出发， 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城市中消费者的构成情况比较复杂，人们的经济收入、生活水平各不相同，生活习惯、生活特点也多种多样。因此，在进行商品分配时，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正确处理一般需要和重点需要的关系，一般需要和特殊需要的关系，集体消费和个人消费的关系。重庆市的做法是，在首先安排好一般需要的基础上，保证重点需要，照顾特殊需要。

首先安排一般需要，就是指首先安排好广大人民群众在吃穿用三个方面的基本生活需要。重庆市的情况，在消费品的零售总额中，吃的部分占百分之四十四点二，穿的、用的部分占百分之五十五点八。在安排人民生活中，做好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工作特别重要。商业部门要协助粮食部门认真做好粮食的计划供应和节约用粮工作，并且切实做好副食品的供应和分配工作。适应群众生活集体化的需要，商业部门要同粮食部门一起，把做好对公共食堂的供应，帮助人民公社办好公共食堂作为当前的一项中心任务。在积极做好公共食堂供应工作的同时，商业部门还要做好对个人消费的供应工作。以七星岗人民公社为例，在今年五月份副食品的分配比例中，公共食堂和国营饮食业约占七成，个人消费和特需供应约占三成。在分配方法上，例如蔬菜，对于集体伙食单位，一般采取直接供应



办法，就是在国家统一计划之下，由公共食堂同农村人民公社直接挂钩；对于个人消费者则送菜到地段，由居民中的分配员协同售货员，按各户人口多少、有无病人和生活习惯等情况，进行合理分配。对于穿、用方面的某些工业品，也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依靠群众进行合理分配的办法。

保证重点需要，主要是指保证厂矿等生产单位的需要。但是，不同的重点单位，对于消费品的需要又各不相同，根据这种情况，商业部门对于不同的商品，要确定不同的分配原则。例如，长统胶鞋、雨衣、劳动保护用品等，首先供应厂矿和建筑工地，然后供应一般消费者的需要。对于广大人民普遍需要的副食品，则是在首先安排好群众基本需要的基础上，给厂矿以适当照顾。为了保证重点，支援生产，工矿区贸易商店，设立车间餐厅、井下服务部，把饭菜送到车间、炉旁、井下；设立夜间餐厅、夜间服务部，满足夜班工人的需要。这样，就把商品分配工作同厂矿的生产结合起来，鼓舞了工人的生产热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适当照顾特殊需要，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照顾某些人在生产和工作方面的特殊需要，如从事高温、高空、井下、水底特种作业的工人和某些脑力劳动者等；另一个方面是照顾某些人在生理条件方面的特殊需要，如老人、病人、幼婴、产妇等。照顾这些人的特殊需要，对于保证他们的身体健康，鼓舞人们的干劲，促进生产的发展，都有好处。有些地区的商店，设立了“寿星阁”、“康复园”、

“儿童餐厅”等，采取发票供应办法，专门对老人、病人和儿童给以必要的照顾。许多商店还协助居民食堂办“老弱专席”、“儿童专席”等，对一些行动不便的孤老病人，还有专人送饭到家。这些办法，体现了党对人民群众无微不至的关怀，深受群众欢迎。

二、建立新的商品分配体系，

吸收群众参加商品分配工作

重庆市商业部门，在人民公社普遍建立了综合性的地区商店（在工矿区叫工矿贸易商店，在学校区叫学校贸易商店），在人民公社分社设立分店。同时，在公社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了以地区商店为主，包括其他财贸单位、群众团体、集体消费单位的代表和居民积极分子参加的“人民经济生活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调查人民经济生活的情况，研究商品分配的具体办法，动员社会力量兴办集体福利事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以及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宣传工作。在居民地段也成立性质相同的“人民经济生活小组”，协助商业部门具体分配商品，帮助群众安排生活。

新的商品分配体系，是以国营商业为骨干，以群众举办的代销店和从群众中选拔出来的商品分配人员为基础的。国营的地区商店及其分店（或综合门市部），统一领导管理公社和分社范围内的商业、服务工作。各地段以公共食堂为中心，普遍设立了由群众举办的代销店（商品分配站）或从群众中选拔出来的代销员（商品分配员），负责本地段内公



共食堂、托儿所、社办工厂等单位和居民的商品分配工作。在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等单位，则普遍设立义务性的商品分配小组或商品分配员，负责本单位职工的商品分配。此外，有的地区商店还专设了特需对象商品分配员，负责各种特殊需要的商品分配工作。这些分配单位和分配人员，在分配商品时，采取通过群众讨论、民主议定的办法，进行合理分配，订立必要的分配制度。例如，对婴儿的白糖供应，经过召开“妈妈座谈会”，把婴儿分为全奶、半奶、无奶三种，确定不同供应标准，结果销售量没有增加，而婴儿的需要又得到了合理保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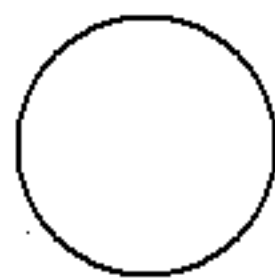
这个新的商品分配体系一经形成，就显示了它的优越性。首先，它适应了城市人民公社化以后，生产和生活集体化、家务劳动社会化的要求，使商品分配机构同生产组织、生活组织进一步结合起来，便于取得人民公社和有关单位党委的领导和支持，从而使商业工作更好地发挥支援生产、组织人民经济生活的作用。其次，它吸收了广大群众参加商品分配工作，进一步扩大了商业工作的群众基础。全市现有二千四百多个代销店，共有七千七百多名代销员、义务分配员，相当于商业从业人员的百分之三十六；遇到节日供应，参加商品分配工作的群众更多。第三，这种新的商品分配体系的形成，使国营商业部门节省了大批劳动力。以上新街为例，这个地区今年上半年零售额比一九五九年同期增加三倍多，但是商业人员却减少了百分之十四。第四，随着这种新的商品分配体系的

建立，商业网点的设置更加合理了，商业的经营管理，也有了很大的改进。

重庆市在依靠群众合理分配商品方面，除了直接吸收广大群众参加商品分配工作外，还定期召开消费者代表会或座谈会，设置意见簿、意见箱，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不断地改进工作。有些地区按照商品分配线路，吸收群众参加对商品分配的监督工作。参加这项工作的群众，还经常向群众宣传党的商品分配政策，协助商品分配员，了解群众生活需要和帮助克服分配工作中的困难。他们同商品分配员之间，建立了密切协作和互相帮助的关系。这样，就促使商品分配得更加合理，党和群众的关系也更加密切。

三、深入调查研究，加强社会统计， 建立经济户籍制度

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对居民的经济情况和消费需求，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社会统计工作，是做好有组织有计划合理分配商品的先决条件。这项工作做好了，商业部门就可以及时组织货源，使商品分配得更加合理，同时可以使产供销三方面的计划更加密切衔接起来。重庆市在开展调查研究和社会统计工作中，采取了建立经济户籍制度的办法，根据分工包干、划片定点的原则，指定专人负责经济户籍员（也就是商品分配员）。经济户籍员的设置，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按照商品分配站设置，如上新街地区商品分配总站，有国营商店派出的经济户籍员十五名，地段的商品分配分站，有群众中选拔的经济户籍



員四十名；一种是按照人民公社的分社来設置，如七星崗人民公社六个分社，共有国营商店派出的經濟戶籍員三十六名，一个經濟戶籍員平均管一千八百多人的商品分配工作。經濟戶籍員必須選擇政治历史清楚，作風正派，群众观点比較强的人充任。对于他們的工作情况，应当随时发动群众进行监督。

經濟戶籍員的主要任务是：經常进行社会調查統計，建立經濟戶籍簿，掌握群众的經濟生活和消費变化情况；宣傳商品供应政策，反映群众的意見和要求，組織群众进行商品分配工作。同时，还协同有关方面，帮助群众发展副食品生产；帮助人民公社办好集体福利事业等。这些任务都是結合党的中心工作进行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

为了实现以上的任务，許多經濟戶籍員，經常向居民进行訪問，定期召开消費者座談会，听取群众的意見和要求，切实掌握群众生活上的需要，为商业部門合理分配商品提供可靠的依据。他們还經常深入公共食堂，做好对食堂的商品供应工作，同时帮助食堂改进經營管理和烹調技术。由于經濟戶籍員在工作中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生活，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具有高度的服务热忱，因此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爱戴，群众称他們是“毛主席的好干部”，是“群众的紅管家”。

四、在組織合理分配商品工作的同时， 积极支援生产和参与組織生产， 指导群众消費，开展社会節約

商品的分配、交换、消費同生产是不可

分割的有机整体。生产是起决定作用的，只有生产发展了，商品流通才能扩大，分配工作才能做好。但是，商品的分配、交换和消費也不是消极的，有組織有計劃地进行商品分配、交换和消費，反过来又能促进生产的更大发展，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甚至对商品生产的发展，能起决定性的作用。重庆市商业部門注意从发展生产出发，把合理分配商品，同大力支援生产、参与組織生产結合起来，同指导群众消費、开展社会節約結合起来，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經驗。

重庆市商业部門，首先注意千方百計地支援农业生产，及时地分配农业生产資料，促进农业技术改造，促进粮食和副食品生产的发展。同时，积极組織原料、材料的供应，支援社办工业的生产，以滿足市場对日用工业品的需要。商业部門还根据需要和可能，挖掘内部潜力，举办了一些生产事业。例如，郭家沱貿易商店在积极支援社办工业的同时，自己开办小工厂，生产本地区市場所需要的某些夏令小商品，今年上半年的产值达到五十八万元，約占該商店全部小商品銷售額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这个商店自办工厂所生产的布鞋、斗笠、草帽、竹簾等五十多种商品，已經从供应不足变为基本上可以滿足本地区的需要，有些商品还可以支援邻区。上新街地区商店自己兴办的飼养場，共养猪一千三百七十多头，养家禽一千八百多只，对于增加市場的肉食供应，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指导群众消費和开展社会節約方面，



商业部門的职工，深入群众进行勤儉建国、勤儉持家的宣傳工作，帮助群众安排收支，并及时发现和推广节约用粮，节约用布，节约用煤，节约使用一切物资的先进經驗。上新街地区商店推广新的裁衣法的經驗以后，全年可以节约棉布二万八千多尺。南岸区商业部門，发动群众改良炉灶，全年可以节约煤炭三万六千吨。开展社会节约的另一个方面，是大力开展修补业务，大搞廢品的綜合利用。七星崗安乐洞修补大街，今年上半年修补的东西，就值二十一万多元。市中区儲奇門商店，今年上半年修补了两万五千多件东西，等于增加了六万多元的貨源。这样做，不仅可以調节某些商品的供需矛盾，而且可以使物资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为社会节约了大量财富，这是应当普遍提倡的。

五、坚持政治挂帅，贯彻群众路綫

重庆市商业部門，在各級党委领导下，在实行有組織有计划地合理分配商品的过程中，始終坚持了政治挂帅和群众路綫的方針，在商业部門的广大职工中，在社会上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克服了种种思想障碍，調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从而保证了合理分配商品工作的順利开展。

重庆市在实行合理分配商品的过程中，曾經解决了在少数人中存在的以下几个主要的思想問題。

有人认为，分配商品是商业部門的事，群众不懂分配政策，依靠群众分配商品行不

通；群众不拿报酬，为啥帮助商店分配商品，等等。持有这些看法的人，不懂得我們的商业工作，既是經濟工作，又是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把商业部門同群众对立起来，不依靠群众，就没有可能做好商业工作。依靠群众合理分配商品，是商品分配形式的一项新发展，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群众不仅关心商品的合理分配，而且他們最了解商品需要的情况。商业部門只要贯彻群众路綫，大搞群众运动，向群众讲清貨源情况和商品分配的政策，充分做好思想工作和組織工作，群众是完全能够参加和做好商品的合理分配工作的。依靠群众进行商品的合理分配工作，并不是減輕了商业部門的工作，恰恰相反，它更加加强了商业部門的工作，要求商业部門在党委领导下，加强組織性、計划性，把工作做得更加細致深入，把經濟工作当作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来做。

事实正是如此。重庆市商业部門的广大职工和社会上广大人民群众，在合理分配商品的工作中，充分发挥了积极性，無論在宣傳教育、調查研究、具体分配等工作上，都做得很出色。例如，七星崗公社的地区商店，在今年春节的商品供应中，就組織了七千多名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組成三十六个供应队，深入群众，进行宣傳工作，調查訪問，征求意见，并帮助商店包扎商品，送貨到地段到食堂，分配到戶到人。不到两天時間，就把七十三万多斤节日商品，分配到一百五十四集体消費单位和一万九千三百多戶居民中，而且分得比較合理，照顾到各种人的生活



习惯和消费特点，群众十分满意。这样深入细致的商品分配工作，不依靠广大群众，不进行广泛的宣传组织工作，是不可能做好的。

群众不拿报酬，为啥帮助商店分配商品。这是对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歪曲。同这种错误看法相反，参加合理分配商品的工作，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例如，溉澜溪商店经营的商品，就有一半以上是群众帮助分配的。上新街商店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上千人自愿帮助商店运送了二十多万斤商品。群众说：“大家的事情要大家办，群众的生活要群众管。”群众就是这样把合理分配商品工作看成是自己份内的工作。

有人认为，合理分配商品，是解决当前某些商品不能充分满足需要的一项临时措施。这种看法也是不全面的。

重庆市的经验表明：有组织有计划地合理分配商品，是一定的历史产物，它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变革而发展起来的。重庆市同全国各地一样，在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就对粮食、棉布实行了计划供应。随着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自由市场的缩小，商品供应的计划性就更为加强。一九五七年又对猪肉、食油等实行了计划供应。广大群众在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计划供应的优越性，而且愈来愈感到习惯；商业部门也从中找到了一条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合理分配商品的良好途径。所有这些，都为合理分配商品的更大发展打下了基础。因此，合理分配商品成为

我国社会主义商品分配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合乎客观经济规律要求的。

实行合理分配商品，不仅在某些商品还不充裕的情况下是必需的，就是商品充足了，也是必需的。在社会经济构成中，生产在任何时候都是起决定作用的。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分配得好，分配得合理，分配形式、分配方法和工作好坏，具有重要的意义。商品分配得好，分配得合理，就能充分发挥社会财富的作用，更好地满足人们千差万别的需求，而且反过来就对生产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事实证明，有些商品，虽然一时还不很充足，但是只要分配得合理，也可以适当满足人们的需要。相反地，某些商品虽然并不少，如果分配得不合理，不但容易造成社会浪费，而且人民生活的需要，也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因此，认真做好商品合理分配工作，对于满足人民需要，促进生产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我们认为，即使在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条件下，合理分配产品也将是极为重要的。认为合理分配商品是一种临时的措施，显然是不全面的。

当然，现阶段对某些商品实行合理分配，仍然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性质，仍然需要利用价值、价格、货币的作用，它同共产主义社会的按需分配有根本的区别。分不清这个界限是不对的。但是，也要看到，充分做好合理分配商品工作，不断加以充实、丰富、发展和提高，也为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产



品分配，积累必要的经验，这也是合乎逻辑的一个历史过程，看不到这个发展前途也是不对的。

也有人认为，商品实行合理分配，不自由，不方便。这要看对什么人来说。有组织有计划地把人们所需要的一部分消费品，通过合理分配的办法，送到地段，分配到户，逐步地形成制度，这对广大劳动者来说，既节省了他们的时间，又使他们得到所需要的消费品，这是最大的自由，最大的方便。同时，合理分配商品，在目前只是对某些生活必需品和其他重要商品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地分配，并不排斥其他许多商品的自由选购，就是在合理分配商品的范围内，人们也可以对某些商品的花色、品种，进行选购。至于对某些一时供应不足的商品，如果不采取合理分配的办法，就不可能保证广大群众的基本需要。重庆市的经验证明，只要我们紧密地依靠群众，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把合理分配商品工作切实地做好，这样，即使在某些商品暂时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也可以适当照顾人们的不同需要，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如果对于商品供应，特别是某些暂时供应不足的商品，不采取依靠群众进行合理分配的办法，而是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经过自由涨价的办法来调节，那样的结果，必然只便利少数剥削者，而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则是根本不利的。

重庆市的合理分配商品，就是在同上述错误思想进行不断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重庆市各级党委在商业部门职工中，不断地加

强政治思想工作，组织广大职工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反复进行了政治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的三大观点的教育，批判了那种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和怀疑、反对合理分配商品等的错误思想。同时，在社会上的广大群众中，经常进行关于经济形势、经济政策和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等方面的教育。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商业职工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促进了合理分配商品工作不断地向前发展。

重庆市实行合理分配商品，虽然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是已经显示出了很大的优越性。它在促进生产、指导消费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通过合理分配商品，保证了人民群众生活上的基本需要，节约了大量的社会劳动，大大地便利了群众，进一步密切了商业工作同群众的联系，使商业工作的根子在群众中扎得更深更稳。通过合理分配商品，使有计划的生产同有计划的分配结合起来，大大地加强了商业工作的计划性，使商业工作愈做愈细，发挥的作用愈来愈大。通过合理分配商品，发展了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的关系，发扬了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精神，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因而党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因此，合理分配商品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重庆市合理分配商品的工作，虽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经验，但是这项工作还有待今后进一步地改进，使它更加巩固和健全地发展起来。



广泛运用运筹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刘季平——

什么是运筹学

什么是运筹学？在说明这个问题之前，先介绍我国古代的一个小故事：战国时候，齐国的国王和大夫田忌在临淄赛马。他们各有上马、中马、下马，竞赛分三场进行，每场以千金作为赌注。拿相同等级的马来比较，齐王的马都比田忌的好，田忌因马力不及，屡败失金。当时有田忌门客孙臆献策，以下马对齐王的上马，以上马对齐王的中马，以中马对齐王的下马。结果，田忌两胜一负，赢得千金。可以说，这里就包含有朴素的运筹学的思想。

在我们的工作中，经常遇到如何最合理地安排和调度人力、物力的问题。如有的地区有余粮需要外调，有的地区则需要从外地调进粮食。应当从哪个产地调多少粮食到哪个销地，可以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方案。但在许多调运方案中，究竟哪一个方案最合理，在运输上最经济，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又如，在水库的综合利用中，为了防洪，水库中的水不能太多；但为了发电，水库中的水越多越好，面对这两种互相矛盾的要求，如何找出一个最合适的水库蓄水量，也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往

往会遇到比较复杂的数量关系。最合理有效的方案，也常常是不能一眼就看出来的。运筹学就是一种科学方法（主要是数学方法），它能帮助我们在规定的条件和要求下，在复杂的数量关系中，找到最合理、最有效的方案。

运筹学作为一个学科，是近二十年来逐渐形成的。它包括规划论、排队论、博弈论等很多分支。规划论是目前发展较快、应用最广的一个分支，它研究的问题主要有两类：一是确定了一项任务，如何以最小量的人力、物力去完成它；二是已有一定数量的人力、物力，如何安排它们，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这两类问题从数学上进行量的分析，就是所谓求极大极小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把运筹学用到他们所占有的企业范围内，作为榨取工人血汗、追逐高额利润的一种工具。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从整个社会来讲，根本谈不到人力、物力全面和合理的安排，因而运筹学事实上也不可能真正得到广泛的运用和发展。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运筹学才



会受到真正的重视，才会在许多国民经济部门中得到广泛的有成效的运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全面地、科学地安排人力、物力，创造了社会前提。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使运筹学能够发挥出较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不可比拟的作用。

运筹学在我国还很年青，只有短短五、六年的历史，但发展相当迅速。特别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出现，对运筹学的研究和推广，造成了大好形势。广大数学工作者决心联系实

际，让运筹学为三面红旗服务，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许多经济工作部门，特别是计划工作和生产管理工作部门，为了更好地贯彻总路线，把经济工作做得愈来愈细致，也纷纷探讨和寻找科学的计算方法，最有效地节约人力和物力，使它们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多快好省地完成任务。这就有力地促进了数学工作者、经济工作者和广大群众的紧密合作，使运筹学近两年来在全国许多地区，得到了更为迅速的发展和有效的运用。

运筹学大有用处

山东省像全国一样，从一九五八年开始重视运筹学的研究。一九五九年十月，在中共山东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从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线性规划着手，掀起了一个研究和运用运筹学的群众运动。通过这个运动，到今年九月，线性规划已在山东全省几十个县、一百多个厂矿、几百个人民公社的部分生产单位中开始推广运用。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几十万人参加了推广运用的工作。这样，我们就把一门过去只有少数专家所掌握的专门知识交给了群众，并为运用运筹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摸索出了一点门路。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山东地区推广和运用运筹学所取得的初步效果。

一、在交通运输方面。根据不完整材料，在全省县以上交通运输部门，由于运用

线性规划调度车辆，减少了车辆空驶率，一般都可以在原有设备条件下，提高运输效率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如济南市汽车运输公司，在保证重点任务的前提下，由于运用线性规划组织了货源，调整了线路，改进了派车、收发、装卸等方法，减少了空车对流和其他浪费现象，实载率由过去的百分之七十一零三，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二点一八；七个月共增加周转量七百万吨公里，相当于解放牌汽车一百七十五辆一个月的工作量。济南市运输公司结合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推行了线性规划，也使地排车实载率由今年一月份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七三，增加到六月份的百分之七十八点零四；六个月共增加周转量四十四万九千零四吨公里，相当于一千二百四十七名工人一个月的工作量。济宁



市運輸公司原有地排車一千七百多輛，過去有時一天空車對流一百六十車次之多，經過推廣綫性規劃後，里程利用率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工人每天的勞動時間反而縮短了。

在鐵路運輸上，運用綫性規劃原理以後，改變了以往到站不合理、專用綫使用不合理、貨場使用混亂等現象。過去濟南站內物資大量堆積，有的物資到站後成年拉不出去，濟南貨場去年下半年最嚴重的时候，積壓物資四萬噸至五萬噸。現在濟南鐵路管理局，推行了綫性規劃，又在產、運、銷方面成立了聯合辦公室，初步抓緊了劃分貨區、固定貨位、統一使用專用綫、改進貨場管理等環節，過去运力嚴重不足的情況已開始有所改善。據今年一月至六月份不完全統計，由於初步調整了物資流向，制定了幾種主要物資的合理到站方案，在全省鐵路運輸方面節約的运力，已達二億三千五百多萬噸公里。

二、在物資調撥方面。過去物資調撥存在若干不合理的現象。有些物資今天由車站拉進倉庫，明天又拉回車站裝車，造成短途運輸和裝卸的額外緊張。這一類現象，自推行綫性規劃後，已有顯著的改變，做到了合理流向，防止迂迴倒流和同種物資對流。如濟南商業局所屬二十七個單位，由於推行綫性規劃，制定了三十八個合理調撥方案，改變了六十四條不合理路綫，縮短了運輸里程八千二百五十二公里，僅今年一月至五月份，就節約运力九十二萬多噸公里，基本上實現

了商品直達化。

三、在工業生產上。我們現在雖然還只在合理下料、機床任務分配、勞力調配、倉庫布局、流水作業等方面，開始進行了一些試驗，但是已經看出了很大效果。合理下料已在金屬加工、建築用材等方面運用，主要是避免大材小用，減少料頭、料邊、料角等，提高了原料材料的利用率。如濟南第一機床廠運用綫性規劃後，鋼材條材利用率，由百分之九十六，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板材利用率由百分之九十五左右，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八。在合理調整機床負荷方面，濟南柴油機廠技工車間三工段運用綫性規劃後，機床效率平均提高百分之二十五，這個工段在今年七月上旬不僅比六月上旬增產九台機床的零件，而且还額外完成了過去幾個月積壓下來的任務。在紡織工業方面，青島國棉一廠，過去一人看四十八台車，每天需巡迴六十至七十里，經過運用綫性規劃後，每人不但少走七里路，還可多看四至五台車。

四、在農業生產方面。全省有不少農村人民公社在勞動力安排、作物布局、場地設置、機井設置、渠道規劃、肥料運輸等方面，由於推行了綫性規劃，也取得了較顯著的效果。曲阜師範學院為公社制訂的麥收勞動力調配方案，執行結果，可節省一萬多個勞動日。曲阜縣陳莊公社，由於合理設置了麥場，安排了勞動力，今年麥收就比去年加快近一倍。濟南市西郊人民公社大金隊十小隊進行麥收



蔬菜合理布局，根据各种不同性质的土壤，不同收获期、收获季节和不同适应性的蔬菜品种，确定出产量最高、复种面积最大的方案，结果产量提高百分之十四点四。

此外，在水利工地方面，試用綫性规划原理，合理安排了土方运输、劳动力调配，效果也很好。如洛口、王旺庄两处工地，由于合理规划了土方运输路线，克服了迂迴交叉等现象，就比原计划节约三十八万个劳动日，提高工效百分之二十。在其他方面，凡是推行綫性规划的，都起了一定作用。如济南市邮电局，試用綫性规划调整了报刊、信件的投递路线，并将投递班次三班改为四班，将信件、报刊合投改为分投，使人民日报等六种报纸，比以前提早十三个小时到达订户手中，信件提前一至一个半小时到达收信人手中，而投递员的工时反而由十小时左右缩短到八小时左右。滕县桑村公社有个

綫组，学了綫性规划后，用图上作业法，实行合理剪裁，提高了工效，大大节省了用布。

这一切，说明了一个道理，运筹学对于我们是有用处、大有可为的。只要我们继续抓紧，还可以推广运用到更大范围去。例如，在全国或一个地区经济的布局方面，在生产计划的积极平衡方面，在劳动力调配的合理计划、原料材料的统一安排方面，在成本核算、产品配套等等方面，都可能有用到运筹学的地方。事实上，全国各地除去有意识地运用运筹学做了许多工作以外，还有很多先进经验，都和运筹学的道理相近、相通，甚至是不谋而合的。如环形供电，产运销一条龙，以及许多搞得好的水利规划、交通规划、城市建设规划等，都不仅符合运筹学的原理，并且为运筹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线索。

推广运筹学的几点经验

怎样具体地开展运筹学的研究和普及工作呢？根据我们在工作中的体会，有以下几条经验，值得提出供参考：

第一，要依靠生产管理机关、数学工作者同广大工农群众的密切结合。

山东省在一九五八年曾抓过一次綫性规划，但未能形成一个持久的运动。一九五九年秋季重新提起了这个问题，起初进展也很慢，没有得到人们充分的重视。这主要是因为有

些数学工作者对这项工作不感兴趣，认为数学是高度抽象的科学，不能直接为生产服务；硬要这么办，就必然要削弱数学的理论研究。他们认为运筹学不是数学科学的正宗；图上作业法、表上作业法等等，更搞不出什么大名堂。而当时有些热心的同志，却没有深入生产实际，也不知道依靠生产机关，走群众路线。他们总认为运筹学是一个新兴的数学部门，普通干部和群众理解不了，只能靠专



門人員來搞。可是專門人員又多半缺乏生產經驗，搞出來的東西往往是紙上談兵，不切實際，引不起大家的重視。生產機關呢，起初也多半沒有注意這個問題，有些同志雖然知道一些，卻又沒有認真加以研究，或者把它看得很神秘，或者習慣於憑經驗辦事，不願多找麻煩，所以對推廣運籌學也沒有全都採取積極態度。很顯然，要搞好推廣運籌學的工作，一定要步步深入，克服上述各種思想障礙，把生產機關、教學工作者和廣大工农群眾都動員起來，並且使三者密切結合起來。

山東省自去冬今春以來，各大大專學校數學系師生，通過鳴放討論，明確了方向，認識到了運用運籌學為生產建設服務，是自己的不可推諉的職責。這樣，山東大學、山東工學院、山東師範學院、曲阜師範學院等高等院校和山東數學研究所的一部分同志，就下定決心，先抓短途運輸。他們親自下去拉地排車，和地排車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商量。這樣一來，這些同志就不僅對於這方面的問題有了更加具體親切的感性知識，而且發現許多運輸工人早已有解決這個問題的迫切願望，同時還發現，廣大工农群眾對運籌學是能夠理解、接受，並能運用綫性規劃來改進自己的工作的。這樣，他們才真正破除了迷信，找到了門路，才放下架子，虛心和群眾商量，听取工人群眾許多寶貴的經驗和建議，搞出了一些真正切實合理的規劃方案；交通部門也由此而重視了這個工作；三者之間才

日益密切地結合起來。現在，這個情況在山東省已經擴大到全省各地區和各工作部門去。綫性規劃的運用範圍，已由交通運輸、物資調撥方面，發展到工農業生產和部分計劃管理機關；參加這一工作的人員，已擴大到高等院校師生和專業研究人員三千餘人，廠礦交通企業管理人員二萬餘人，部分中學師生和小學教師十萬多人，工农群眾中的積極分子二十多萬人。

第二，從綫性規劃入手，深入淺出，點面結合，造成一個廣泛普及運籌學的群眾運動。

為什麼要從綫性規劃入手呢？這是因為綫性規劃所用的計算方法簡便，一般只用加減乘除，容易為廣大工农群眾所掌握。同時，在許多工作中，都用得着它，抓住了這一環，就能迅速取得成效。人們在掌握了綫性規劃以後，就會感到還需要很多比綫性規劃更複雜的高等數學知識，如需要非綫性規劃、動態規劃，需要排隊論、概率論等等方面的知識。所以一方面要從綫性規劃入手，一方面又不能僅僅局限於綫性規劃，要根據實際可能，把其他一些確有需要的數學方法，特別是屬於運籌學範圍的各個分支，也逐步加以普及。但要這樣做，不能把現有高等數學完全照原樣搬到群眾中去，一定要深入淺出，儘可能採取通俗易懂、簡便易行的形式和群眾見面；而且要儘可能和群眾自己的實際經驗結合起來，逐步加以發展提高。綫性規劃的圖上作業法、表上作業法之所以受到群眾



的欢迎，就在于此。

我們要在大跃进的革命群众运动中，从綫性规划入手，掀起一个大讲运筹学、大搞运筹学的热潮；要动员有关的数学工作者，深入研究和宣傳运筹学，特别是要将綫性规划交给工人和农民，使他們能掌握这个工具，运用到各項社会主义建設工作的实际中去。

第三，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并且要时刻注意把推广运用、理論研究和培养干部三者密切結合起来。

过去有些人认为，科学研究和用科学来为生产服务是背道而馳和互相矛盾的；特别在一向号称高度抽象的数学科学方面，这两者更是南轅北轍，不可能两全其美。可是根据我們的体会，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虽然从山东全省各有关单位来讲，运用运筹学的工作发展得还很不平衡，但从总的方面看，山东这个原先在运筹学方面几乎是一张白紙的省份，仅仅經過将近一年的時間，就已經开始补上这个空白了。深入生产实际，甚至到地排車工人里面去，并没有降低山东省的数学科学的水平；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深入实际，倒使全省差不多所有高等院校数学系的师生和部分中等学校的教师，更多地接触到了經濟生活中无数复杂的数量关系，因而不仅在运筹学这門空白学科方面，开始培养出了一批师資和干部，而且写出了几十篇研究論文，其中有些問題的探討，对运筹学理論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第四，更重要和最基本的一条經驗，就是要加强党的領導，坚持政治挂帅，正确地貫徹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在这个基础上，积极运用运筹学这个工具。

一年来，我們正是坚持了这个方針，从而在若干单位运用运筹学，作出了一定的成績。但是我們决不能把运筹学的作用，过分加以夸大。运筹学的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它只是一种科学的計算方法。只有在党的总路綫的指导下，坚持政治挂帅，使运筹学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才能在有关的工作中，更好地算細賬，挖潜力，减少浪費，提高工作效率，使党的总路綫在这些工作中得到更好的貫徹，发挥出更大的威力。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即使在某些个别环节上运用了运筹学，也将流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事倍功半，无济于事。

上述各点，只是过去几年来一些初步体会。由于我們在这方面，还只是作了若干嘗試，時間还不长，工作的发展还不平衡，加之我們在工农业生产方面，都还存在着不少問題，所以我們不能有絲毫的自滿。今后，我們必須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高举三面紅旗，认真执行党的方針政策，不断改进工作作风，虛心学习兄弟地区的先进經驗，鼓足革命干劲，把这项工作坚持发展下去，不断巩固提高，使运筹学这一有力的工具，更好地更广泛地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

(編者按：本文作者是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



搞好生活，促进生产

王桂冀

关心群众生活，安排群众生活，是我们党一贯的优良传统。人民公社化以来，适应生产发展和群众生活的需要，在生活方面也基本上实现了集体化。因而，我们党所担负的关心群众生活、安排群众生活的任务就更加重大。生产和生活，是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只有搞好生产，才能改善生活，同时，把生活安排好，就能够更好地促进生产。在过去社员一家一户完全单独过日子的时候是如此，在实现生活集体化以后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曾明确指出：“党在领导公社工作的时候，必须注意全面地抓思想、抓生产、抓生活。”又指出，“群众的干劲越大，党越要关心群众生活。党越是关心群众生活，群众的干劲也会越大。”几年来，唐县县委对于生产和生活的这种密切的关系，对于党中央的这些指示的正确性，有深刻的体会。我们在中共河北省委、保定市委的领导下，认真地贯彻了党中央的指示，在工作中一贯注意了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把两者密切结合起来。

安排好群众生活，现在最主要的一环是办好公共食堂。唐县各级党委自一九五八年起就领导群众建立公共食堂。开始，主要是建立农忙食堂和部分主要劳动力参加的食堂。由于群众深切体会到办公共食堂的好处，公

共食堂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一九五九年，全县就基本上实现了公共食堂化。经过不断地整顿和提高，全县绝大多数公共食堂已经走上了巩固和健全发展的道路。在食堂内部树立了贫农、下中农的领导优势，食堂的炊事员和管理员，一般都是由群众挑选出的大公无私、办事能力强、为群众所信赖的贫农、下中农担任。食堂还普遍地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开展了家底生产。为了节省劳动力和便于改善伙食，许多食堂都进行了炊具改革。两年来，全县已有一千四百六十三个食堂（占全县食堂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实现了炊具半机械化，已有三百四十五个生产队（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六），基本上实现了米面加工机械化。为了办好食堂，今年以来，有一千多名各级党委的书记深入食堂，并下放了大批干部到食堂当管理员；全县公社机关的干部食堂一律撤销，原来机关食堂的管理员、炊事员下放到生产队，帮助办食堂；所有到农村工作的干部（包括县委书记在内），都与社员一起搭伙。所有这些，都进一步密切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促进了农村食堂的巩固和提高。

当前，在全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大好形势下，为了把公共食堂办得更好，我们集中力量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是管好粮食。管好粮食是办好食堂的重要保证。管粮食同做其他工作一样，必须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我们采取的办法是：粮食收打以后，将产量、征购任务、应留的种籽、社员口粮、饲料等“底码”全部向群众亮明，并且，通过群众讨论制订用粮计划。然后，将种籽、饲料、口粮、储备粮分库储存。对社员口粮，执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以人定量，节约归己的制度。食堂一般都建立了用粮日记账、分户账、粮食总账，以及粮票收发、粮食加工、客饭登记等表册，作到了账目日清月结，定时向社员公布。社员每月节约的粮食，按照“节约归己”的原则，要钱给钱，要粮给粮。实践证明，实行这样一套粮食管理制度，有许多好处：可以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管理粮食和节约粮食的积极性；可以更主动地安排群众生活，作到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使群众吃得又饱又好；可以提高粮食的保管水平；等等。

其次，大抓蔬菜等副食品的生产 and 储备，并搞好粗粮细作。蔬菜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品，食堂伙食办得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蔬菜的供应情况。因此，县委在办好公共食堂的工作中，特别注意抓蔬菜生产。现在，各个食堂都建立了自己的蔬菜基地，确定专人进行管理。各级党委还发动社员利用“十边”闲散地和采取粮菜间作的办法，种植了大量的蔬菜。今年全县共种蔬菜七万六千亩，其中白菜三万九千亩，萝卜和其他菜三万七千亩。由于勤管理，巧安排，一般的食堂都做到了常年有足够的鲜菜吃。许多食堂还储备了大量的咸菜、干菜。此外，不少食堂还喂养了猪、鸡等家畜家禽。约有百分之七十的食堂已

经作到自给节日所需的肉食。

粗粮细作，也是改善伙食的一项重要措施。为了做到粗粮细吃，县委通过召开现场会议和办短期训练班，培养炊事人员和制淀粉的技术人材，在全县普遍推行甘薯制淀粉的方法。将甘薯制成淀粉，可以用来蒸馍蒸糕，味美适口，并可以提高甘薯的利用率，节约粮食，因此很受群众欢迎。今年全县种了二十七万亩甘薯，收获后我们准备将三分之一的鲜薯制成淀粉，以便进一步改善群众伙食和节约粮食。

第三，进一步提高食堂炊事员和管理员的业务水平。食堂的炊事员和管理员是经过群众挑选的，他们一般都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了把群众生活搞好，不辞劳苦，任劳任怨。但是，办食堂毕竟是一项新的工作，他们还缺乏足够的经验和办法。为此，县委和各公社党委定期召开炊事员和管理员会议，总结和交流经验，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平时，各级党委负责同志经常深入重点，总结经验，及时推广，指导全面。如县委书记郝殿士同志，深入到仁厚镇公社长古城生产队，帮助该队总结了食堂管理员办好食堂的经验：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认真执行党的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的政策；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改进食堂的工作；关心体贴老、弱、病、残；当好炊事班长，自己带头干。这些经验在全县推广以后，大大提高了炊事员和管理员的工作水平。

由于我们抓紧了以上这些安排群众生活的工作，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社员在秋收、秋耕、秋种等突击工作中，干劲很高，生产任务完成得又



快又好。今年冬播的三十万亩小麦，大部分都施足了底肥，实行了合理密植，播种质量良好，为明年夏季丰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安排好群众生活，进一步办好公共食堂，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唐县县委在安排群众生活的过程中，突出地抓住了以下四个重要环节：

第一，抓思想。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灵魂，离开了它，将一事无成。安排群众生活，是一件非常细致的工作，要把这项工作做好，首先必须解决一部分干部的思想问题。对于党的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的指示的重要意义，在全县干部中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得很清楚的。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还存在一些错误观点。比如，有的认为，“生产不抓不行，生活可以放松一些。”“抓生活就会影响抓生产。”还有些人认为，在物质条件比较困难的时候，才需要安排群众生活，在物质条件比较好的时候，就不需要安排群众生活。

为了端正一部分干部的片面观点，县委组织干部反复学习了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并且组织广大干部和社员开展以“生活与生产的关系”为中心的大讨论。通过讨论，大家明确认识到，关心群众生活，是革命者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衡量每个党员、干部是否有群众观点的重要标志。在讨论中，大家列举了无数事实说明生产与生活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比如，一九五九年唐县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水灾。当时，有的干部、社员产生消极畏难的情绪。县委从安排生活入手，领导全县人民开展生产自救，很快地安定了大家的情绪，并且赢得了全面大丰收。

又如，今年夏季，全县二十九万亩小麦同时成熟，十二万亩夏季作物需要同时播种。按照当时的劳动力情况，根据往年的惯例，完成夏收夏种任务最少也要十五天的时间。当时，由于各级党委注意了妥善安排群众生活，更好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他们自动地起早贪黑，开展了高工效竞赛，结果十五天的任务，十天即全部完成。事实证明，哪里能够在抓生产的同时，又能安排好群众生活，那里的工作就主动，群众干劲就大，困难就容易克服，生产也就会迅速发展。如果只顾生产，而不关心群众生活，不认真解决群众生活当中的实际问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就会受到影响，生产也不会搞得很好。

作好思想工作，还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经常分析广大群众的思想动态，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唐县今年虽然遭受到七十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大旱，但经过全县干部和群众的抗旱斗争，赢得了丰产。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群众对于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以丰补歉、支援灾区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群众中进行了“算五笔账”的思想教育。如算生产条件变化的账，使大家看清楚，公社化以来，全县在水、肥、土、种、密等农田基本建设和生产条件方面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成就。还算粮食消费量增加的账。全县有二十九万名贫农、下中农社员，在解放以前，他们平均每人每天只消费四两粮食，解放以后，粮食消费量有了很大的增长。算几年来由于适当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农业基本建设和非农业人口的增加，所增加的粮食消费量等。在算五笔账的同时，还着重地向广大群众说明全国的灾情，引导群众回忆一九五



六年本县受災时，受到全国二十八个省、市支援的情况，教育群众树立勤儉節約的观点和一地受災大家支援的共产主义風格。

第二，事事主动，步步提前。在安排群众生活中，我們深深体会到，要管好几百人、上千人为一个单位的“大家庭”的生活，必須事事爭取主动，一切从早着手。比如，还在今年秋收以前，县委就組織各級干部和社員一起，測定了粮食产量，并且制訂了全年的用粮計劃。因此，从秋收开始，就实行了計劃消費，防止了浪費。今年夏天种秋菜的时候，就考虑到明年春季种菜的种籽問題，組織各社、队规划了一千九百亩菜籽基地。目前，各級党委又在及早安排群众冬季取暖的燒柴和食堂的冬季用煤。此外，还安排了种植冬菜的土地、肥料、种籽和每人每天儲备三斤干菜的計劃。

第三，抓两头带中間，通过总结重点的經驗，指导全面。这是毛澤东同志一再教导我們在工作中采用的馬克思主义方法。唐县在安排群众生活的过程中，始終注意运用这一方法来指导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县、社党委經常以一个食堂为基点，培养典型，总结經驗。比如，为了解决粮食加工問題，县委生活办公室在仁厚鎮公社园子生产队，帮助社員試制了石碾磨；为了使食堂飯菜多样化，在望都鎮公社小西堤生产队，帮助炊事人員研究了粗粮細作的办法，并就地召开了現場会，进行推广。两年来，全县共总结和推广了三十多項关于搞好群众生活的重要經驗。

为使后进地区赶上先进地区，县委抽出一部分干部成立了一个办公室，专门負責后进地区的工作。同时，还下放了五百三十四名

干部到工作力量較薄弱的地区，实行定人定点，一包到底。由于各級書記以身作則，带头到后进地区、办得較差的食堂去工作，因而就能及时发现問題，解决問題。县委书记魏清海同志，到曹庄公社南王疃生产队落户以后，发现这个队的食堂粮食加工效率很低，他立刻同队干部商量筹划，办起了一个粮食加工站。

第四，抓評比竞赛。搞好群众生活，需要培养一批有觉悟、有办法的管理群众生活的工作人員。为此，县委經常組織檢查評比，規定每月初一、十五日為公社生活檢查日，三十日為县檢查日。通过檢查評比，树立标兵，交流經驗，使后进单位树立起革命的英雄主义思想，急起直追，使先进单位受到激励和鼓舞，从而推动組織群众生活的工作不断前进。

为了充分发挥食堂工作人員的积极性，在炊事員和管理員中普遍开展了“十好”（政治思想好，坚持学习好，服务态度好，遵守制度好，飯菜調剂好，技术革新好，食堂卫生好，飼养管理好，团结友爱，勤儉節約好）評比运动。同时，通过树立先进标兵（包括管生活的支部書記、食堂的管理員和炊事員），广泛开展学先进、赶先进的竞赛运动。經過評比竞赛运动，大多数的炊事員和管理員都树立了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思想。

安排群众的集体生活，对我們來說，經驗还很不够。但是，我們坚信，只要依靠党的領導，充分发动群众，坚持干部深入食堂、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風，我們一定能够把食堂办得更好，把群众的生活安排得更好，促进生产持續跃进。

（編者按：本文作者是中共河北省唐县县委第一書記）



碭山縣的田間科學研究活動

劉欽鑑

一九五八年以來，安徽省碭山縣為了適應農業生產大躍進的需要，採取領導幹部、技術人員和社員三結合的辦法，大搞群眾運動，廣泛開展了田間科學研究活動。生產隊建立了科學研究小組和田間科學研究簡易試驗室，生產大隊建立了田間科學研究試驗場（站），公社建立了科學研究所。到目前為止，全縣已建立田間科學研究小組二千七百多個，田間科學研究簡易試驗室三萬多間，田間科學研究試驗場（站）八十多處。參加研究工作的，有二千多個技術人員、九千多個幹部和大量的社員。他們緊密結合當前生產，圍繞貫徹執行農業“八字憲法”，進行了大量的田間科學研究活動，研究項目越來越

多，由過去少數技術人員對個別作物、個別品種的種植試驗，發展到廣大群眾對多種作物、多種品種的種植試驗，包括深翻、密植、施肥、播種期以及雜交、嫁接等等。這些研究，有力地促進了農業技術的改革和農業生產的持續躍進。

群眾性的田間科學試驗，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以來農業科學研究工作上出現的一種新形勢。自從中央發布全國農業發展綱要

（草案）以來，特別是經過一九五七年冬季的大搞水利建設，一九五八年全縣出現了大躍進的局面。廣大幹部和群眾為了提前實現農業發展綱要規定的指標，千方百計地尋找增產措施。針對這種情況，縣委積極組織技術人員下鄉，幫助群眾研究增產措施；並以社為單位，舉辦社員技術訓練班。這樣做，比起過去技術人員單純坐試驗室閉門研究的狀況，是前進了一大步。但是只靠這種辦法，還遠不能適應生產大躍進的需要。同時，由於我們的農業技術人員大部分是從學校出來不久的青年，缺乏實際生產經驗，他們還不能把書本知識和生產實踐、試驗室的研究和大田生產很好地結合起來。因此，如何使科學研究與生產緊密地結合，以適應大躍進的需要，就成為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一九五八年春季，縣委根據黨中央發出的各級幹部種試驗田的通知，領導全縣各級幹部培植小麥試驗田四千七百多亩。這些試驗田的產量一般比大田的產量高得多，這對群眾的影響很大，許多社員也積極要求種試驗田。到一九五八年底，全縣參加種試驗田的人數達四萬多人。這一年種的試驗田，絕大多數都獲得高產，起了指導生產的作用。通過種試驗田，廣大幹部和群眾認識到開展科學研究的重要；科學技術人員也認識到實踐是科學之本，千百萬勞動人民的生產實踐是科學發展的源泉，認識到農民不僅能學科學、運用科學，而且能夠發展科學。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採取幹部、技術人員和社員三結合的方法，廣泛組織科學研究小組，普遍開展了群眾性的科學研究活動，為正確貫徹“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科學為生產服務”的方針，开辟了廣闊的



道路。

两年来，群众性的田间科学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首先是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社员对于农作物生长、发育规律的认识，并逐渐摸到了一些按照农作物生长发育规律来促进农作物增产的办法。例如，碣山县小麦的主要品种是南大二四一九、碧玛一号和葫芦头（当地品种），它们都具有产量高、抗病力强的特点。但过去由于对这些品种的生长、发育规律认识较差，往往播种季节掌握得不够好，影响增产的效果。经过群众性的田间科学研究，认识到南大二四一九春性较强，不宜早播，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早播的都产生年前拔节被冻坏的现象，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就集中在晚茬地种植。碧玛一号和葫芦头品种，冬性较强，宜于早播，我们就集中在早茬地实行早播。这样根据品种特性安排播种时间的结果，对各个品种的增产起了促进作用。又如，通过在土温室里进行甘薯越冬试验，知道甘薯有长期生长的特点，因此延长它的生长期，是保证增产的重要措施。我们先是采取早排茬口的办法，扩大春种面积，为甘薯的增产创造条件。但扩大春种面积，需要大量的秧苗，只靠火炕育苗难以满足需要。后来经过试验，研究出土温室育苗的办法，能提前栽秧二十天到一个月。一九五九年冬天，群众又在田间土温室进行甘薯藤的越冬试验，即落霜前把老甘薯藤放在土温室，通过控制温度，使它既不干枯，又不生芽，能够安全过冬，第二年再栽到大田。这样可以比温室育苗提早二十多天栽种。实行这种办法，每亩还能节约几十斤甘薯种。

在认识农作物病虫害的发生、发展规律和防治病虫害方面，两年来也取得了许多成效。过去小麦锈病年年发生，一九五六年发生锈病的麦田占小麦田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左右，造成大量减产。自一九五八年开展群众性科学研究以来，广大群众认识到，小麦叶锈病和条锈病的病菌生存能力很强，病菌在苗期就发生，在气温摄氏零点五度以上就能发展，二十度左右则大量发展。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抓紧幼苗期的防治和四月中旬发病盛期的全面防治，小麦锈病已逐年减少，一九五九年发生锈病的麦田只占小麦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今年则基本上控制了锈病的发展。又如谷子，过去每年都有藏谷虫发生，发现后虽然也迅速进行除治，但始终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通过田间科学研究，群众认识到藏谷虫是五月中下旬在幼苗根部产卵，生虫后钻到幼苗内部，用药剂来杀一般是无效的。因此就研究出根据它的产卵期提早防治的办法，效果良好。

通过开展田间科学研究，广大农民也掌握了一些关于农作物杂交的知识。比如，对小麦不同品种的杂交，进行了二十多种试验，对玉米不同品种的杂交，进行了十八种试验。从小麦的人工杂交和自然杂交中选出的优良品种，都具有产量高、抗病抗灾力强的优点。如东风人民公社吴集青年队选出的东风一号，具有很强的抗灾能力。今年四月中旬有五天霜冻，五月初小麦又发生锈病，五月底又刮了几场“干风”，而东风一号小麦既抗住了霜冻，也没有生叶锈病和条锈病，并抗住了“干风”的侵袭，因此获得了大量增产。该队试验的玉米杂交品种，每棵一般长穗四



至五个，穗大粒饱，比金皇后品种提高产量一倍以上。通过这些试验和研究，广大农民逐步认识到，农作物的优良品种，不是天然产生的，而是经过劳动人民长期的培育逐渐进化而来的。只要我们经常进行杂交的试验，就可以不断地改良品种，促进农业的增产。

通过田间科学研究活动，广大群众还进一步认识了农作物生长发育与外界条件的相互关系，从而能够更好地挖掘自然潜力。对农作物生长发育起影响作用的外界条件，主要来自土壤和气候两方面，如日光、空气、温度、水分、肥分等。要大幅度地增产，决定性的关键是挖掘土壤的潜力和充分利用气候条件。土壤是农作物生长发育的基地。广大群众通过田间科学研究，认识到深耕施肥、改造盐碱地，是挖掘土壤潜力、提高土壤肥力的根本性措施，因此，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拿改造盐碱地来说，碭山县共有耕地一百二十万亩，其中盐碱地占了十九万亩，产量很低。一九五八年以来，广大群众采用洗碱、压碱、换土、多施有机肥料等综合治理方法，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如一九五九年采用洗碱改种水稻的办法种水稻一万六千亩，采用压绿肥、带施穴肥改造盐碱地的办法栽种甘薯二万一千亩，都收到了增产的效果。

为了保证农业增产，广大群众在作物种植方面还研究出了一些适应气候条件和进一步挖掘土壤潜力的办法。如高秆作物与低秆作物间种，对充分利用光照起了积极作用。例如，光照对棉花影响最大，不能通风透光，就会造成蕾铃大量脱落。棉花和甘薯间种，一方面能解决棉花光照问题，另一方面由于甘

薯喜高温，间种后白天有助于增加温度，夜晚有助于热度的消散，因而对甘薯生长也十分有利。又如深根作物与浅根作物混种，既能提高土地利用率，又能使分层施下的肥料和渗透地下的水分都能被作物吸收。

经过两年多来群众性的田间科学研究活动，还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人材，许多农民成为技术员、土专家。如隳海人民公社王古楼青年试验场的六十多名青年队员，原来很少人懂得农业技术知识，经过两年的田间科学研究，他们绝大多数成为农业科学研究中的骨干。科学研究所专家孙永安总结了群众的经验，改谷子春季播种为冬季播种，这样谷子能提前一个多月出苗，避免每年幼苗期受截谷虫的危害，而产量比春季播种的高得多。这一经验今年已在全县推广。

经过两年的实践，我们对大搞田间科学研究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群众性的田间科学研究，必须抓住农业增产关键去进行。我们发展农业生产是“以粮为纲”，田间科学研究就必须以寻找粮食增产措施为中心。两年来，我们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多种多收与高产多收相结合的方针。在多种方面，基本上把荒地开完，“十边”种满。在争取高产方面，我们主要抓扩大高产作物种植面积、提高复种指数和改良土壤三个环节。因此，田间科学研究就主要围绕这三个方面来进行。例如，扩大高产作物种植面积的一项根本措施，是改种水稻。可是，碭山县地下水源不足，雨水在春夏较少，多集中在夏末和秋季。适应这种情况，群众研究出水稻“早播水管”的种植方法，有效地克服了改种水稻的困难。为了提高复种指数，



广大群众也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找出許多間种、套种的办法，很多生产队都达到了一年四种三熟。实践证明，只有紧紧圍繞着解决增产关键进行科学研究，才能更好地贯彻科学为生产服务的方针，有效地促进生产的发展。

二、开展田间科学研究，必須使干部、技术人员和社員密切結合，試驗与推广密切結合。干部、技术人员和社員共同組成田间科学研究小组，是多快好省地开展科学研究的好形式。田间科学研究是要掌握农作物的生长規律，这就需要丰富的实际經驗，占有大量的材料。广大群众由于常年累月从事田间生产，实际經驗最多，占有的材料最丰富，因此，他們能为田间科学研究提供多方面的綫索和宝贵的意見。干部和技术人員，具有领导經驗和較系統的理論知識。三者密切結合，就能互相取长补短，發揮特长，使田间科学研究迅速获得成效。

試驗与推广相結合，边試驗，边推广，边提高，也是搞好科学研究、促进农业生产的重要一环。只有把試驗与推广紧密結合起来，把研究成功的經驗及时进行推广，才能达到全面提高生产水平的目的。生产水平的全面提高，又把田间科学研究推向新的更高的水平。我們在田间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一貫注意推广的工作。两年来已經推广的經驗有七百多种。例如王古楼生产队在一九五八年試驗冬播谷子成功以后，县委組織专人总结經驗，一九五九年全县的科学研究小组都进行小面积推广，經過这一年的实践观察，証明冬播谷子具有抗病力强、产量高的优点，今年便在

全县大田推广。这样就使科学研究的成果迅速运用到生产中去。

三、田间科学研究，必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决不能把它看成是单纯的技术工作或技术部門的事。两年来田间科学研究工作的胜利，是党加强领导和坚持政治挂帅的结果。开始搞群众性的科学研究时，有些人认为社員文化低，不能搞科学研究。我們批判了这种看法，指出社員虽然文化低，但是由于他們有丰富的实际經驗，容易懂得事物的内部联系，因此也就完全能够走进科学的大門。在批判这种不相信群众能够搞科学研究的右傾保守思想的同时，我們也帮助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树立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風格。同时，各級党委书记都亲自参加科学研究，加强具体领导。在試驗中少数人走了弯路，遭到失败时，党組織及时帮助他們找出失败的原因，吸取教訓，鼓励他們繼續大胆試驗，大胆創造。这样就充分調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保证了田间科学研究的順利开展。

群众性的田间科学研究，已經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有的地区开展得还差一些，有的地区与生产結合得不够好。今后必須更好地贯彻“理論与实践相結合，科学为生产服务”的方针，把已經取得的先进的生产經驗，迅速地普遍地推广到大田生产中去，同时，繼續发动群众提高田间科学研究水平，使田间科学研究工作在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运动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編者按：本文作者是中共安徽省碭山县委第一书记）

